

Global Media Journal

全球传媒学刊(X)

《全球传媒学刊》编委会

主 编： 郭镇之

本辑特邀主编： 李彬 周庆安

副 主 编： 周庆安 卢嘉

编 辑 部 主 任： 曹书乐

编 辑 部 副 主 任： 戴佳 李红霞

编者的话

电子学术杂志《全球传媒学刊》第十期按期上网了。

第十期《全球传媒学刊》设立了两个封面专题，一个是“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特邀李彬教授主编；另一个是“新闻发言人”，特邀周庆安副教授主编。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这个专题的四篇文章，来自李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其中，姚遥的文章“建构软实力：中国对外宣传的‘术’与‘道’”以开阔的视野，介绍了“用世界的话语解释中国”和“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的应对之策；王辰瑶副教授的文章“‘节制’报道：一种新新闻叙述观”体现了新闻报道中的伦理思考；刘宪阁的文章分析了“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的历史案例；黄卫星的文章则详细分析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背景。本刊集中刊发这些文章，是希望学界关注和讨论作为全球一部分，也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的新中国新闻传播的话题，从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新闻发言人》这组专栏，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史安斌的“微博时代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从理论探索、角色重构和前景对策等方面，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在新技术时代的特点进行了翔实的归纳和概述。孟建和林溪声的“西方主要政党新闻发布经验与我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以中外对比的视角，对西方传统和中国在建国前后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两篇文章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实问题有比较明显的借鉴意义。

与中国新闻传播的话题相关的，是郭镇之的“中国电视‘走出去’与新华新闻电视网的创新之路”的当代新闻史研究论文。文章以对外宣传与传播中国的研究主题与以上两个专题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一期中国视角的全球传播论述。

郭镇之

全球传媒学刊(电子刊) 第十期
2012年6月出刊

目录

特邀主编 李彬
特邀主编 周庆安

编者的话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

- 建构软实力:中国对外宣传的“术”与“道” 姚遥
“节制”报道:一种新新闻叙述观 王辰瑶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之台前幕后 刘宪阁
新中国与新文化——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语境为例 黄卫星

新闻发言人

- 微博时代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 史安斌
西方主要政党新闻发布经验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 孟建 林
溪声

全球传播研究

- 中国电视“走出去”与新华新闻电视网的创新之路 郭镇之

附录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期外请讲座与学术论坛信息

CONTENTS

EDITOR'S NOTES

NEW CHINA'S JOURNALISM HISTORY IN THE PAST 60 YEARS

1. Constructing China's Soft Power: The Technique and the Essen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YAO Yao)
2. Moderate Report: A New Concept of News Narrative (WANG Chenyao)
3. An Re-examination about the News Product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Wreck of Bohai II (LIU Xiange)
4. New China and New Culture: The Context for the Creation of Music Dance Epic "*The East is Red*" (HUANG Weixing)

NEWS SPOKESMAN

5.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Role Re-modeling of China's "Spokesperson System" in the "Era of Micro-blogging" (SHI Anbin)
6. The News Release Experience of the Main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ews Spokesperson System Construction (MENG Jian& LIN Xisheng)

GLO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Chinese Television Going Global and the New Way of CNC (GUO Zhenzhi)

APPENDIX

Information of Recent Lectures and Forums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

建构软实力：中国对外宣传的“术”与“道”

Constructing China's Soft Power:

The Technique and the Essen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姚遥^①

中文摘要：建国后，借助大众传媒与人际交往，新中国与外部世界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宣传与传播活动。本文期待揭示：对外宣传事业不仅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梦想，更深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历史传统；只有在“追求现代”与“承继传统”之间求得平衡，同步提高对外宣传事业的“术”与“道”，才能建构并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并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关键词：对外宣传，软实力，现代化，国际认同

Abstract: In order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lways tried its bes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virtue of the mass media and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This essay tries to argue that (1)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t only reflect the national dream of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year of 1840, but also roo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s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and; (2) we must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tradition,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 technique and the essen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o that we can construct and enhance China's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w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eventuall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oft Power,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① 姚遥，清华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人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项目编号：09AXW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自姚遥主持的子项目《新中国对外宣传》。

建国以来，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持续不断地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主旨明确的长篇故事：“我是谁”。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个故事不断述说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建构着中国的身份与认同，塑造着中国的敌人与朋友，并促使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一步步走向中心。

那么，六十多年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对外宣传事业是如何成为沟通中外的纽带与桥梁的呢？

一、对外宣传事业的“术”：用“世界的话语”解释中国

无可否认的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好处，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所言：

现代化的吸引力是无法抵御的。不管人们怎样评价现代化，反正它在物质生产力上的无可否认的勇猛之势，给一切有物质兴趣的人（没有这种兴趣的人是绝少的）突然打开了希望之门。^①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促使中国人反思和向往。一百多年来，以“现代化”为方向，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和变革，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路向着现代的工商业文明高歌猛进。这个过程恰如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评论：

我可以概括的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大帝国。但是中枢不赖武力及经济力量操纵全国，大部分时间靠文教的力量统御。最近一个多世纪，中国有一个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段长期革命，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之下。……宏观看来，中国历史仍有它的规律与节奏，其目的是脱胎换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融合于世界的潮流，即完成所谓的现代化。^②

“现代化”，无疑也是新中国肩负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1954年8月，依靠在日内瓦会议上结交的人脉关系，周恩来总理千方百计将英国前首相艾德礼邀至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将新中国的国情与使命做了最坦诚的说明：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③

毋庸讳言，当西方国家处于工业文明的制高点时，落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便不得不与之交流，不得不向其学习。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问中国，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向美方提出了购买超高速计算机的意愿。从美国国务院的谈判纪录中不难发现，在西方国家面前，中国领导人可谓用心良苦——既要在经济上有求于人，又要防止在政治上授人以柄：

邓小平：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你们可能不能给，比方说，运算速度千万级的计算机。我们倒也不认为类似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关系。

基辛格：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已经拒绝了给苏联提供这些类型的计算机。（此时邓小平朝痰盂吐了一口痰）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批准一些高品质的计算机出口给贵国的，前提是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也能同时维持好。

邓小平：我想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贸易部门去协商，你们如果觉得现在实在有难处，我

^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6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2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16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们其实也不在乎,没啥子大不了的。^①

借助其强大的经济与科技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有可能在政治上对落后国家予取予求,在国际舆论界亦获得了“高人一等”的话语权,诚如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公共关系顾问迈克·麦德沃(Mike Medavoy)所言:

在全球争取民心向背的角逐中,美国曾经占了上风,因为它支配着形象、偶像和信息的流动,更别提由于美国以及此前大英帝国的霸权,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②

于是,在一场业已由西方国家掌握了“标准制定权”的形象竞赛中,为了能够实现有效沟通,中国的对外宣传便不得不借鉴“世界通用的语言”以解释中国,运用普遍通行的方式以对外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然而,恰恰在此方面,中国的对外宣传时有失败的教训。2010年12月10日,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主管对外援助工作的时任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曾经讲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

我举个例子,2004年印尼海啸的时候,中国的国际援助是最快的,我们马上筹集了大量的食品,比如双汇的香肠、德州的扒鸡等,派专机送过去。但说实在的,就对外传播国家的形象而言,那次效果并不好。首先,食品上的标识都是中文,当地民众看不懂,到最后竟然不知道是谁送的;接着,突然有消息说这些食品是过期的,后来我们一查,原来是因为国内这些厂家不采用国际标准,包装上印的是生产日期而不是过期日期;此外,双汇香肠是猪肉的,而印尼大部分人都信仰伊斯兰教,结果让人家非常反感。这说明我们在对外传播自我形象时,有些工作还做得不够细致,没能用国际通行的方式对外表达,有时候好心办坏事。这就是软实力的差距。^③

在21世纪的今天,之所以要借鉴“世界的话语”,还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与网络化趋势密切相关。在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极大地提高了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这促使中国必须学会使用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技巧与宣传创意。在此方面,麦德沃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在一个资源开放的全球温室中,传统的宣传已经过时,因为宣传再也不能捏造事实。简单的谷歌搜索就能拆穿所有的谎言和粉饰,贴在网上的手机视频就能破坏任何人想抹杀历史的努力。……比尔·克林顿所言极是:在这个信息奔流的环境中,人心的向背必须有说服力的支持,是榜样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样之果。^④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向西方学习使用新技术以发展工业;今天,中国人还必须向西方学习使用新的媒介技术以讲述“中国的故事”。与美国相比,中国还不善于通过电影、电视和音乐等生动形象的流行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对外彰显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对外宣传成就时一般只告诉人们成就和结果,没有过程,这些成就怎么来的、怎么产生的都没有解释。比如,中国脱贫是个好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没有过程,只有枯燥无味的数据。没有过程就没有角色,西方媒体就特别擅长讲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教授的既要为学生写推荐信,也要看很多别人的推荐信,中国教授写的推荐信一般只是说这个学生多么用功、成绩多么好,都是结论性的话。外国教授写的推荐信有细节、很生动,看了以后让人了解学生。推荐信应有血有肉,让人了解到活生生的一个人。外宣也是这样,不能机械地解读,要避免意见太多、结论太多。^⑤

^① Burr, W.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9. 403-404.

^② [美]迈克·麦德沃等:《全球媒体时代的软实力之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形象》,何明智译,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③ 傅自应:《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非出版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谈纪录,2010-12-10。

^④ [美]迈克·麦德沃等:《全球媒体时代的软实力之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形象》,126页。

^⑤ 王眉:《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把中国模式解释好》,载《对外传播》,2011(1)。

当然,进一步观察,中国对外宣传的问题绝非只是“术”的匮乏,更加根本性的症结恐怕还在于“道”的失落。在与“世界的话语”求同之时,对外宣传更需要探索和总结有异于西方世界的“中国的话语”。“同”与“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关系,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精辟论述:

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使中国人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而每一个人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①

二、对外宣传事业的“道”: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

说到底,对外宣传的目的在于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信息,并争取其同情和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对外宣传的本质即是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然而,倘若连自己都对“我是谁”不甚了了,那么不论传播技巧何等高明与先进,对外宣传也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便是“术”与“道”的分别。

遗憾的是,在某些方面,比之“世界的话语”,中国人现在对于“中国的话语”甚至更加陌生。中国与西方,自然禀赋不同、文化背景有异、历史命运殊途,很多看似中西互通的词汇与概念,其实背后包含着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脉络。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

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②

客观而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迷失自我,并非起自1949年才建立政权的新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项长期课题,哲学家梁漱溟即曾感叹:

自世界有学问的人看去,中国之为不可解的迷也久矣!“亚洲的生产”“东洋的社会”不是在马克思亦不得不以例外而看待么?^③

自1949年建政后,新中国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直至经历了一场“压缩饼干式”的现代化奇迹——把其他国家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都压缩在了六十年之中。^④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人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道路上走得太快,以至于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对外解释自己的经验,诚如郑永年所说:

中国有很多好的经验,比如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政策等。中国的外宣想把好的方面介绍给西方,但效果不好,问题主要在于没有自己的话语,借用别人的话又说不清楚。作为技术层面的外宣,现在经常忙于救火,比较被动,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⑤

那么,究竟哪些中国经验是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是对外宣传事业所应重点着墨的。

1、中国的农业社会

1945年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时,道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现实——那何尝不也是今日中国最重要的现实: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居民,农民。在中国的4亿5千万人中,他们至少占3亿6千万。

^①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戴开元译,309页,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② [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亮生等译,14~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2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④ 胡鞍钢:《胡温五年实证评估报告》,见玛雅:《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⑤ 王眉:《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把中国模式解释好》。

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商人、资本家仅仅是上层的少数。农民就是中国。像中国这样大而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很快就改造好。在未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①

乡土社会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非但毛泽东看得明白,就连美国领导人也一清二楚。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将贵为五星上将的马歇尔派往中国调停国共内战。据杜鲁门回忆,他和马歇尔很快便发现,固守城市的蒋介石军队必败无疑:

蒋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们有一种想依靠筑有城墙的城市的变态心理。他们认为空旷的地区是危险的。空旷地区本是他们应该驻扎的地方。但是他们认为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妥当;因为他们能够看见人们进来。自然,没有人来,他们就住在城里。共产党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破坏了他们唯一的铁路线……^②

马歇尔曾反复告诫蒋介石:像共产党那样扎根农村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共产党能够轻松切断国民党的任意一条供应线与交通线。^③

毛泽东、杜鲁门和马歇尔都读懂了中国的现实——在乡土社会的中国,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城市与农村永远都是无法割裂的整体。今日中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广为西方舆论所诟病的所谓中国人的“素质问题”,都与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彻底完成直接相关。

如何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特征解释清楚,为中国发展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这是对外宣传事业的一大挑战。

2、中国的政治格局

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缺乏内在统一性的帝国,只是靠着集权的力量才将不同区域拢在一起”。^④

事实上,一国政治格局的形成是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传统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无疑与其早熟的农耕文明有着不解之缘。早在先秦时期,大江南北的农业居民们即不断思索着如何才能应对天灾人祸的各种威胁——天灾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水患,人祸主要是四方诸侯的战争。因此,当梁国君主请教“天下如何才能安定”时,孟子的答案言简意赅:

定于一。^⑤

对于“小国寡民”的西方传统而言,中国的“大一统”格局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然而,这种“大一统”的格局能够存续千年,绝不可能是单凭强力所能维持得了的。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曾经如此分析中国古代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

(中国在)国内统治的时候,中央和地方并存,制度上虽然是中央集权,实际运行却是以地方为主导等因素。^⑥

即便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着广泛的地方分权与内部竞争,绝非“集权”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认为,激烈的“县际竞争”才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限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

^① [美]约翰·S·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32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②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1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内部发行。

^③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100页。

^④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

^⑤ 《孟子·梁惠王上》。

^⑥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洋菲译,34~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①

对外阐释中国内部的竞争、多元与开放,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对外宣传的深层使命之一。

3、中国的民族格局。

涉及中国西藏和新疆的某些话题,时而会引发西方媒体的渲染与误读,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的一家之言:

作为一个集体,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硬要将自己挤入现代国家形式的文明。^②

西方学者将当代中国看作是“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与西方的传统格格不入。文化学者汪晖曾说:

在当代世界,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它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如何叙述中国这样一个不但多民族、多宗教而且多文明的跨体系社会(trans-systemic society)始终是一个问题。^③

在此方面,中国的对外宣传若要有所成就,必须突破西方理论的成规。因为倘若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模型,中国的多民族现状就成了根本无法解释的“异类”。事实上,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多民族格局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费孝通先生早已论证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④

至晚在清代,通过和亲、通婚、朝贡贸易、支援发展等形式,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个容纳着多种文明的富于包容力的弹性社会。对于强调“与异教徒之间势不两立”的西方基督教传统而言,“和合”与“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确实是不易理解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的外宣事业所应着力之处。

4、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冲突,这也正是西方媒体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当下中国发展的根源。

不过,稍微公正的西方人即会发现,中国的对外政策向来是与他们有所区别的。在回忆中美建交的过程时,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透露了美方的一个重要考量:

有了中国这个朋友,还会有个很有意思的潜在的好处,那就是它能悄悄地改变我们本来很难与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多数的革命政府当然不会自然而然地倾向美国,苏联人经常有办法建立新的关系——大部分是通过向他们出售武器。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信誉非常好,我们把同中国的合作看成是促进和平和加深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途径。^⑤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正是中国独特的对外政策出发点。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这样概括中国的软实力:

所谓中国软实力,我以为就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尊重,就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尽力帮助它们。^⑥

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并且真心实意地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即是中国向世界郑重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时任商务部副

^①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14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② Pye, L..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ix.

^③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50~51页。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36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⑤ [美]吉米·卡特:《保持信心》,裘克安等译,18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⑥ 温家宝:《在第三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上答问》,新华社大连电,2009-09-11。

部长的傅自应讲述了很多富有说服力的鲜活事例:

有一次我与欧盟驻利比亚的发展援助代表聊天,我问他们的休假制度怎么安排,他告诉我说,他们所有的援助专家三个月要回欧洲休一次假,每一个专家来的时候可以有三个集装箱运自己的家具,往返都坐着飞机头等舱,然后住着当地最好的酒店,这些钱花的都是本应援助当地的经费。与他们相比,我们中国的专家和工人的待遇根本没法比,我们是带着感情做事的。^①

为了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能够更加深刻地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对外宣传还需要做更加细致的工作,发掘并讲述更多更加生动形象的真实故事。

三、建构中国的软实力: 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使命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软实力”的命题。2004年,他进一步将“讲故事的能力”看作是21世纪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

传统上,胜负取决于哪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强。然而,在一个全球信息时代,胜负还取决于哪个国家更会讲故事。除了军事硬实力以外,我们还需要运用能够赢取人心的软实力——一种以价值观和文化而吸引他人的能力。^②

那么,中国应如何对外宣传和介绍自己,又该如何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恐怕,以西方国家为参照,这个命题依然要在“同”与“异”之间寻求平衡。

公平而论,近代以来,即便没有西方人的侵略与掠夺,中国人也必须主动做出改变与革新,以使乡土社会的亿万同胞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与现代文明。换言之,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若要向工商业社会转型,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取经,必须与西方国家交流和互通。

于是,在这个与西方国家“求同”的过程中,如何介绍中国发展的困难与成就,如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认同,也即成为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使命之一。

1、追求富强。

富强,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大梦想,也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关键主题之一。

早在晚清,居于朝堂之上的李鸿章即已看清,唯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求强求富”,唯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够抵御外侮、救亡图存: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板、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③

科学与工业,的确是传统中国最薄弱的发展环节。农业社会的深厚传统,使得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徘徊不前。于是,及至民国时期,科学与工业的发达程度已成为中国是否走向富强的公认标志。193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其专著《中国近代史》中提出: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④

及至新中国成立,追求富强的工业化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对外宣传事业亦主要围绕着工业化的目标而展开。1970年,77岁的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其所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的落后面貌:

^① 傅自应:《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非出版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谈纪录,2010-12-10。

^② Nye, J. Today, It's a Question of Whose Story Wins, Los Angeles: LA Times, July 21, 2004.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①

2、维护独立。

没有民族独立的前提,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富强的目标。

1896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洋访问的政府首脑,李鸿章在曼哈顿著名的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②

遗憾的是,李鸿章和清政府终究未能保全中国的神圣主权。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曾给李鸿章去信,痛陈中国的主权尽失:

自甲午以来,割台湾,割辽东,订中俄密约,助西伯利亚铁路之速成,割广西毘脱之土司,割胶州,割旅顺、大连,割威海,割九龙,割广州湾……中国已非复中国人之中国,则万目所共见,而百口所不能辩也。”^③

于是,在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中,民族独立便成为中国不得不率先争取的首要目标,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22年时的预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它的工业相当落后,所以,中国的自然资源是由中国自己开发,还是由日本人或西方来开发,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也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世界和平的前景、俄国的命运甚至发达国家向更好的经济制度发展的机会。^④

近代以来,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落后挨打,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开发利用自己的国土与资源,中国只得以“斗争”与“革命”的方式去争取和维护民族的独立自主。于是,一方面,中国要学习西方的经验和科技;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得首先挣脱西方的压迫与掠夺。这实在是一个中国式的悖论——只有通过一种“反现代的现代化”或曰“反西方的西化”,中国人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诚如日本学者酒井直树的概括:

假如东方不曾抵抗,它永远不会现代化。^⑤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危险的国际局势,对外宣传成为军事与外交之外,中国维护自身独立的另一条战线。1965年9月29日,面对美苏两霸的南北夹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在北京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用其火辣的四川方言对外宣示了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六册)》,494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发行,1988。

^② Li on American Hatred.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896.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卷》,55-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④ [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6页,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⑤ [日]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见张京媛:《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4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①

3、阐释民主。

如何使乡土中国的亿万民众，告别贫穷、落后、不识字的传统生活，成为国家发展的真正主体？从1911年建立共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最近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关于民主的实践与探索，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之一。及至今日，中国的民主事业依然尚在建构之中，诚如黄仁宇所说：

中国放弃传统昊天明命的皇权，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结构及民间彼此放租的习惯，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上猛进一步。今后的修订还待两种思想体系琢磨切磋而成，尤待经济继续发展构成多边社会的需要而定。^②

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剧烈地转型，民主问题不时成为西方舆论用以攻讦中国的由头。如何把中国民主化的特点与困境阐释清楚，这是对外宣传的一大挑战，郑永年教授的建言可资借鉴：

全民选举并不意味着能把最优秀的人选出来，西方民主也不是谁跳出来就可以当选的，如果统计一下西方政治家的背景，会发现大部分不是富豪就是贵族，平民很少，比如美国的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选举成了几个家族的事。而中国很多官员来自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这些都要说出来，才能让西方信服。^③

某种意义上，“富强、独立、民主”不单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而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普遍目标。然而，无可回避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扩张、消耗与称霸等问题。正因如此，除了上述三项“求同”的使命以外，中国的外宣事业尚且承担着另外三项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历史使命。

1、消解对立。

在西方历史上，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往往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影响下，致力于实现对于“他者”的改造、同化甚至消灭。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有当我们不是谁，而且经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④

整个20世纪，在西方思维主导的国际关系史中，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美苏冷战。及至21世纪，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依然以西方式的“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世界，恰如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时的对外宣示：

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真理：邪恶的确存在，但它一定要被战胜！^⑤

近代以来，在亡国灭种的险恶形势逼迫下，中国人只得以“斗争”与“革命”的方式保家卫国。新中国建立后，在美苏对立的“二元格局”中，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不得不选择了与大国“对抗”和“结盟”的对外方略。然而，时移世易，一俟冷战结束，国际环境有所改善，中国人随即回复了持续千年的“和合”传统——“不结盟”、“伙伴关系”和“和平发展”先后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轴。

“对抗”还是“和合”？“文明冲突”还是“协和万邦”？

两种国际价值观的较量，将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命运与前途。对此，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有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① 孙建娥等编：《中国领导人答记者问纪要》，56~5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② [美]黄仁宇：《大历史怒会萎缩》，5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 王眉：《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把中国模式解释好》。

^④ [英]巴里·布赞：《美国 and 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⑤ [美]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载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guojj/209/7389/7390/20020130/659082.html>，2011-03-18。

2、拒绝消耗。

西方的现代化实践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

21世纪初,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是全球人均资源消耗量的5倍多。^①换言之,世界人民如果都要实现和美国人民一样的资源消耗量,人类将需要5个地球的资源总量,以支撑这一宏伟的目标。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工业化的老路绝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

诚如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在2010年时所言,即便美国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中国人绝不能学的,是美国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以及美国人的超前消费:

中美两国领土面积相当,而美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远远优于中国,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如果中国人达到美国人那样耗费物质资源的程度,大家都住大房子、开大车,中国受不了,地球也受不了。^②

“超前消费”还是“可持续发展”?“消耗资源”还是“天人合一”?

对于中国——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如何确立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既让中国人过上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又不堕入消费主义与过度消耗的陷阱,将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一场严峻考验,也是中国改善国际社会的一种可能契机,更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课题。

3、反对霸权。

历史上,不论是英国、德国,还是美国、苏联,脱胎于西方文明的国家,都曾以“超级大国”和“独霸世界”作为其国家发展的梦想与目标。

什么是超级大国?什么是独霸世界?1974年,邓小平代表新中国,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做了如下阐释: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③

更具体而言,1960年5月,当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东西方的两位杰出军事家对于美国的霸权本质做了十分清晰的界定:

蒙哥马利: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泽东: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外国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④

历史的经验证明,谁妄图独霸,谁就注定要走向衰落;谁到处出兵,谁就必然会深陷战争的泥潭;日本、德国、苏联,历史上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及至21世纪初,世界上依然有一个国家执迷不悟地在这条不归路上踟蹰独行。其实,当美国过度消耗着全球资源时,“独霸世界”便成为其维持发展的自然逻辑——否则,它便无法维持其国内民众的高消费水平。

“独霸”还是“分享”?“四处出兵”还是“和平合作”?

对于中国的对外宣传而言,“复兴”与“崛起”的民族梦想,必须与西方的“称霸”之梦划清严格的界限,恰如毛泽东在1957年就外宣工作所作的批示: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

^⑤

^① WWF. “Ecological Footprint Atlas 2009”,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fr/index.php/gfn/blog/year/2009/>, 2010-03-11.

^② 王缉思:《持平平常心、做普通人——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http://www.sis.pku.edu.cn/web/Browse.aspx?id=1322>, 2010-08-09.

^③ 周南:《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217~218页,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 426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 283页.

四、结语

今时今日,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二位,朝着民族复兴的梦想继续迈步向前。然而,放眼未来,在新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中,它究竟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建构什么样的身份、争取什么样的认同,又应该通过对外宣传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早在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其名为《追寻现代中国》的专著中,如此界定了自己心目中的“现代中国”:

本书叙述的是寻寻觅觅的过程,而非寻索的结果。我能理解,一个“现代的”国家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我个人倾向认为,到了公元1600年,已存在具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都算不上是现代国家,在二十世纪末亦然。^①

在笔者看来,时至今日,一个“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的“现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并未完全成型的未来时概念。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然而,在固守西方理论的人看来——其中既有外国人、也不乏中国人——中国的发展经验却似乎很难被理解。

正因如此,为了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争取“现代中国”的国际认同,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依旧任重而道远。及至今天,中国不是完美的,世界也同样不是完美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言犹在耳: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②

为了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的故事”还将被继续书写,并需要被更加准确而精彩地传播给全世界。

回顾历史,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恰似沟通中外的水道和桥梁,其中承载着古今多少事,既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不乏“秋月春风,几度夕阳红”;放眼未来,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互通无远弗届,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一个更加公平与公正的世界,都将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催生。

八千里路云和月,重整河山待后生。

^① [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序,温怡溢译,台北,时报出版。

^② 《孙中山全集》,639~6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

“节制”报道：一种新新闻叙述观

Moderate Report: A New Concept of News Narrative

王辰瑶^①

中文摘要：中国新闻实践在新世纪以后萌生出对新闻之叙述本性的警觉意识，一些记者开始倡导有“节制”的新闻叙述观念。在当代新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这一现象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提出了一种新闻实践的新范式，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新闻界的自觉意识——在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复杂的情况下，新闻当以何种方式来观照时代。

关键词：新闻叙述，节制报道，孙志刚事件

Abstract: In the new century, some Chinese journalists raise their guards on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news and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moderate report. This new concep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ress. It is not only a new paradigm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but also a reflexivity of press-how to reflect society in a more and more complex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ws Narrative, Moderate Report, Sun Zhigang Incident

^① 王辰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项目编号：09AXW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自王辰瑶主持的子项目《新中国新闻作品》。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陆定一在六十多年前提出的新闻定义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新闻”与“事实”的关系:作为本原的事实是第一性的,而报道事实的新闻则是第二性的。对这一对新闻学“元概念”之关系的澄清极其重要,陆定一据此回答了为什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问题。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他精彩地阐述了新闻必须符合事实的真实性原则并尖锐批判了违背这一原则的法西斯主义新闻学。但当时人们尚无暇顾及作为“第二性”的新闻自身的特点。而随着哲学中“语言学转向”对各社会科学的广泛影响,新闻学虽然较晚却也终于意识到这个“第二性”的深刻含义:除了要服从于“第一性”外,新闻对第一性“事实”的呈现也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对事实的重新组织与结构。这种观念有助于破解人们尤其是新闻界的客观性“迷思”,揭示出新闻专业主义规则下依然存在各种权力关系,从而对新闻的“叙述”本质怀抱一份敬畏、对报道与事实的关系更添一份警惕。虽然看似有些“瑟缩”,不够光荣或豪情,难以满足新闻界的“英雄主义”期待,但其蕴含的“自反性”其实是能使新闻职业免于自大、自我调整的一剂清醒剂。西方新闻学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客观性”之争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批判性思潮对新闻客观主义的反思,即大致反映了上述思路。中国新闻学在近六十年中的发展图景与之有根本差异,但进入新世纪后却殊途同归地出现了对新闻之叙述本性的警觉,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六十年来新闻与时代的关系,除了从新闻报道撮取的时代片段中可一窥究竟外,从报道自身的叙述方式上亦可查究。正如当代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说,叙述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解人们是怎样理解的”,理解新闻报道对于当下事实之建构方式的变化,本身也是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新闻的一种思路。比如,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闻的理想主义叙事与80年代新闻呈现的宏大激情叙事,既有很大的不同,又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大体上讲,前者突出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伟大与优越,基调乐观、欢欣、积极;后者突出改革开放的势在必行,基调激越、磅礴、思辨。但两者在新闻叙述上都是更注重对事实的意义开掘,而鲜少注意事实的呈现方式。新闻业对时代的观照倾向于直接介入、直抒胸臆、力促其变,这既是忧患中诞生的中国近代新闻业鲜明的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传统的延续,也是较单纯的党报体系下媒体的定位使然。但是这种新闻叙述的弱点在于自信有余自省不足、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意图鲜明但规范不足。因此它容易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新闻报道的立场、情感、倾向在短时间内变动过巨的情况,也容易在时代激情退却后让人指摘报道本身与事实真相的距离。这两种情况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都发生过,它势必会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影响新闻报道与时代的长久、稳定、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80年代末期,新闻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叙述方式粗疏、急躁的一面,开始在深度报道热中反思事实与观点的关系。因为历史原因,这种调整未能真正践行。90年代重新启动的媒体改革则是另一种路径,它通过发现“生活”、拥抱“市场”,部分回避了以前的问题,开掘出新的局面。其对新闻叙述的影响在于一方面大大拓宽了新闻的报道领域,将过去视为“无甚高论”的普通人生活、市井新闻、社会性新闻纳入常规报道领域,并根据受众市场的细分发展出大量的专业性新闻报道;另一方面,降低了新闻叙述的调门,改变过去教化意味浓重的宣传腔,主张平民化、亲切可读、与读者同气相求、情感与共。这两方面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新闻界的自我定位,但由于尚缺乏对既往历史的全面省视、缺乏对变化迅速的新闻业的清晰界定,新闻界的“主体意识”仍显不足,这导致了一些没有“定力”的表现如乐衷炒作、情绪化等,同样招徕了批评。可以说,新世纪以后在一些记者中出现的对有“节制”的新闻叙述观念的倡导,正是出于对上述两种情况的反思。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种新闻实践的新范式,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新闻界的自觉意识——在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复杂的情况下,新闻当以何种方式来观照时代。

新世纪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个案中,“孙志刚事件”是很难被人遗忘的。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左右,来广州工作不到20天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去网吧的路上,因没有暂住证也没带身份证被巡街警察送至派出所,后被送到收容站,再被送到收容人员救治站。3

月20日，救治站宣布孙志刚身亡，死因是“心脏病”。但蹊跷的是，第一，孙志刚大学毕业，有身份证、工作单位和固定住所，并不符合“收容遣散”的相关规定。在孙被“收容”的3天里，他的朋友和老板曾带着各种证明孙志刚身份的材料到派出所和收容站“保释”他，都未被允许；第二，救治站出示的孙志刚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而孙的家人和朋友俱称他身体一向很好，从未有这方面的疾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鉴定书明确指出：“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且“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也就是说，孙志刚是被打死的，而不是死于心脏病。一个身体健康、有正当工作和合法住所的公民，只因未带身份证件上街，竟至在被收容过程中打死，这是法治社会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3月底，《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组记者陈峰在网上看到了有关此事的网帖，并得知孙的家人正在广州奔波，为孙志刚之死讨说法。《南方都市报》记者王雷和陈峰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在4月25日发表了后来引发巨大轰动的调查性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在尽可能还原孙志刚生命最后三天的诸多事实细节的同时，也将孙志刚事件推向不容回避的公众舆论浪尖，此后人们多将“孙志刚事件”视为中国在推进公民权利方面的一个标志和象征符号。

这篇报道引发的一连串反响是：刚一见报，新浪网上就出现几千条评论，编辑部热线几乎被打爆；4月26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南方都市报》关于该事件的报道，《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开始接力追踪报道此事，“孙志刚事件”成为网络舆论热点，人民网网帖质问“孙志刚案，是谁在‘装聋作哑’”；5月13日，新华社以《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13名疑犯被缉捕》为题报道该案疑犯已被缉捕的消息。称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高度重视此案，公安部派工作组赴广东督办，由广东省、广州市成立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侦破；5月14日，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1日，北京的一批知名学者专门就此案和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讨；5月23日，5位知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呼吁要从“详尽的真相、公开的程序、必要的质询”入手，把孙案圆满解决；6月5日，广州中院开庭审理此案；9日一审判决12名罪犯的刑事责任；10日，涉案的其他23名违反党纪、政纪的有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严肃处理；6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原则通过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22日新法规颁布，同时废除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办法》，多家媒体关注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变化。至此，孙志刚事件在被媒体曝光的不到两个月里不仅有了具体的处理结果，而且废止了一项已实施20多年的法规，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标志之一，舆论监督的效果不可不谓显著。此事最早报道者陈峰回忆，得知新法规颁布后，正在湖南采访的他特意“出去给自己点了份几十元钱的牛排，以示庆祝”。^①

从表面上看，这确乎是又一例以报道推动社会进步的经典个案，并再次书写了媒体人的“光荣与梦想”，但从对该事件及报道的文本与语境的细读中却不难看到某种隐在的变化已经产生，它显示了上文所述的“节制”报道的新新闻叙述观念。在孙志刚事件中，有大量评论或欢呼媒体影响力，或慨叹舆论影响的实际效果有限（出现这两种相反的评价本身也是该事件一项引人瞩目之处），但鲜少关注到最初报道文本的“节制”姿态。这种“节制”表现在：每一个具体事实都交代来源，如源自孙志刚的朋友、家人或记者掌握的某份材料等；没有“现场化”、戏剧化的场景描绘；几乎没有出现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注重呈现事实而非得出结论，比如报道的几个小标题分别是“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除了前两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外，后两个孙案中的核心问题均以疑问的方式提出，报道重在陈列和比较所获得的来自各种渠道的事实，并从比

^① 蒋伟：《孙志刚不会被忘记——对话孙志刚事件首发记者陈峰》，载《法制周报》，2008-08-29。

较中提出疑点，而非通过大胆的推测“暗示”结论。有意识地抑制报道的情绪性和从事实中过度推导结论的冲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是“记者控制自我之‘像’而忠于事实之‘像’，由此完美地达到新闻记者应该达到的职业水准”。^①那么这种新闻记者的自我节制的叙述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它对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种自我节制的新闻叙述观念来自于复杂新闻生产环境对报道者的“倒逼”。陈峰回忆最初看到孙志刚事件的线索后并不认为这是个可以发表的报道，因为在内地工作多年的“经验”让他“已经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②这种所谓的“风险”客观上已经构成一个新闻文本能否问世的潜在条件，它实质上就是各种形式的权力（政治的、经济的）与以新闻话语形式出现的权力的矛盾关系。在新闻官司平均胜诉率较低的大环境下，新闻记者们发现能够支持新闻话语与其他干涉性权力关系相制衡的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对事实本身的无可争辩的、精确的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职业意识本身就是在社会关系中互动的产物，而非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如前所述，新世纪新闻生产环境变得空前复杂，社会大环境和新闻业小环境俱是如此。在社会总体进步的推动力下，各种具体利益的博弈也越来越显在、直接，新闻生产者尤其是最容易与其他社会关系产生直接利害冲突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对事实的精确报道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技术手段，这并不奇怪。例如，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河北定州血案真相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揭黑”报道闻名的记者王克勤在谈及调查性报道的基本问题时也强调“揭发报道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反扑，为了确保记者自己的安全，也要确保证据齐全。有了铁的证据，才能够呈现事实的真相。记者要学会保守地、谨慎地写作，写新闻永远不能文学化、情绪化，更不能慷慨激昂、随意宣泄。要知道被监督对象连你的标点符号都要研究，他们会挖地三尺，一定要挖出你的问题，没问题都要找出问题的。为了保护自己，也要做得更加专业才是。可以说，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逼出来的。”^③在这位曾用半年时间采访北京市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和相关人士、曾用7个月时间在山西“潜伏”调查问题疫苗的记者看来，所谓职业化其实是一个胆子越来越小、叙述越来越严谨的过程。只有这样，记者天职中那些最为高尚的部分、最激动人心的理想主义才能有所附丽，并有可能在报道所招致的巨大压力下继续生存。这并非一句空话，首先报道了孙志刚事件和山西疫苗事件的媒体确实都遇到过“巨大的压力”，如果报道本身再有可被指摘之处，很难说新闻界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其次，对事实复杂性的认识也催生出报道者自我节制的叙述观念。报道与事实的距离曾是一个不太被关注的问题，中国新闻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更多的是正确性的问题，或者说多多少少用正确性置换了真实性。新世纪之后，报道与事实的距离开始为新闻从业者所关注，甚至敬畏。这种敬畏源自：其一，对事实挖掘难度的认识，大量事实其实是记者采访不到也还原不了的；其二，对自身认识角度的反思，不同的认知角度完全可能关注或凸显的是事实的不同层面，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其三，对事实与意义关系的思考。不少新闻史上的名篇都曾用强大的意义链条将事实的主题“完美”得呈现出来，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却往往要承受着事实本身的破碎、断裂甚至矛盾之处的拷问，这种拷问甚至威胁到原有意义的存在，也让新闻从业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两者的关系；其四，对事实与叙述方式关系的思考。写得好看、吸引人与报道的真实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过去在新闻写作中很少讲两者的矛盾之处，但实际上，在追求效果冲动下的新闻叙述往往可能超越记者实际的叙述能力，从而僭越真实本身。诸如此类的顾虑成为一些颇有思想性的记者在进行新闻生产时的权衡因素。如在孙志刚事件中，尽管不少后续评论对孙案没有实质性地启动违宪审查机制以及在制度反

^① 李书藏：《〈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首次报道中的理性和自律成份分析》，载《现代传播》，2004（3）。

^② 陈峰：《一切发生在意料之外——孙志刚事件采访记》，载《今传媒》，2005（3）。

^③ 王克勤：《调查性报道基本问题梳理》，载《法治新闻传播》，2011（2）。

思力度方面仍有质疑，但我们看到的最直接的事实依然是：打死孙志刚的凶手是与其本无瓜葛的救治站护工和同样被收容的人。正如有媒体提出的，这到底是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或许应该是在恶性制度下被扭曲的人性之恶导致了孙志刚的悲剧才比较贴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片面强调或暗示某单一结论的报道都可能扩大与真相的距离。报道者陈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当被问及为何没有在报道中采用惊心动魄或细致的镜头化描写方式时，陈峰回答：“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写法可能比较好，甚至更高级，但这些场景，我们采访不到。”^①采访不到的“空白”之处其实就蕴含了太多的可能性，而记者的主观推测或情绪性的暗示则会在这些空白之处摒弃掉其他的可能性，只留下记者“心目”中的“真相”。

以上两个“外因”和“内因”共同改变了记者的叙述观念，尽管这种改变只能说刚刚开始，尚未成为新闻界的职业共识。过度推导、情绪化、贴标签的新闻写作方式仍屡屡可见，但是鉴于上述理由，新闻界内部也不断出现对这种简单武断的“标题党”、“标签党”新闻的反思和自我批评。如随意给报道对象贴上“富二代”、“官二代”标签而罔顾具体事实的细节，这样的报道也许一时迎合了某种社会情绪，造成轰动效应，但长久来看势必既损害新闻自身信誉，更伤害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毕竟新闻业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与理解，而非制造社会分裂。

^① 张志安、陈峰：《我不写孙志刚，迟早会有人写——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六》，见《青年记者》，2008（2）。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之台前幕后

An Re-examination about the News Product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Wreck of Bohai II

刘宪阁^①

中文摘要：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披露与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史特别是新闻改革史上提出了许多可以探讨的问题。不过关于这些报道背后的新闻生产过程，比如到底有哪些媒体和记者，在何种社会情境下，怎样采写、编辑、制作了这一系列有影响的报道，虽亦时见讨论，但总体上还不太清楚。本文拟对此略作尝试性勾勒，以为下一步研讨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新闻生产，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journalism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port on the Wreck of Bohai II could be discussed from many perspectives. Among them is the news production, which has got certain inves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but still needs more examinations.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who had made such an influencing report, especially how they did it and in what social atmosphere. Such an attempt may be helpful in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Wreck of Bohai II, News Production, Xinhua News Agency, *People Daily*, *Worker Daily*

^① 刘宪阁，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项目编号：09AXW001）的阶段成果之一，出自刘宪阁主持的子项目《新中国新闻史纲》。

梳理当代中国新闻史,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披露与报道是无法绕过的一章。诚如当年就有论者指出,此事“在新闻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可以总结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报道和事故报道的模式,开启了深度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之先河,当然亦可谓新时期报纸批评或者今天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之滥觞。^①不过关于这些报道背后的新闻生产过程,比如到底有哪些媒体和记者,在何种社会情境下,怎样采写、编辑、制作了这一系列有影响的报道,虽亦时见讨论,但总体上还不太清楚。^②本文拟对此略作尝试性勾勒,以为下一步研讨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报道背景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凌晨,而首次公开披露报道已是1980年7月22日(新华社21日晚先发出消息,各报随后跟进)。其间相隔近八个月。为什么会隔这么久,而且起初主要是几家中央级媒体在报道,地方媒体基本没有介入?这就不能不说到当时的新闻环境。

事故发生后,《天津日报》因地利之便(海洋石油局就在天津),很快就派记者去了解情况。但是初步了解情况之后,在报还是不报上,报社领导犹豫了:这样大的事故,死这么多人,又涉及石油部,中央和市委又没有指示,因此,“对公开报道想也没敢想”。^③

地方媒体不敢报,中央媒体又如何呢?新华社记者要闻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随后发出内参,接着却是意味深长的沉默。《工人日报》也派出记者进行过采访,但是遭到阻挠。阻力何在呢?其一在于,有人想捂着。起初相关责任者对事故原因和性质讲了三点看法:“气象突变,突遇大风,事故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完全不提这是“责任事故”。随后更拒绝接受采访,反对公开报道。^④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风气。这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危害,给新闻战线也带来不少恶果。比如动辄就指责报忧是抹黑,会使人泄气,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甚至被敌人利用。^⑤扣上这样的大帽子,谁还敢轻易报道呢?

此外,“新闻报道思想上僵化半僵化”亦可注意。比如习惯于等到一项工作、一项工程结束之后再报道成绩、总结经验,而无视“新闻的特殊规律”,当然也和“对新闻的指导性的认识片面有关”。^⑥

更重要或者更直接的原因,毋宁是中央迟迟没有表态。毕竟事关重大,甚至触及更高层次的领导。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后来也一再指出,不是不可以报道和批评,但至少须有中央点头或许可。没有这样的尚方宝剑,轻易报道,风险难测。

好在当时社会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思想也在日益解放。层层阻力正在被冲破,尽管这个过程颇为不易,但毕竟在朝好的方向推进。这也使得新问题可能出现新答案。^⑦

在此过程中,还有些事不能不提及。比如关于生产目的大讨论,尤其是松树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披露。这次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3日晚上,比渤海二号沉船还早两天。随

^① 相对于新闻传播视角大多所持的肯定态度,近年亦出现其他层面的反思,比如对石油工业等之冲击。典型作品如何建明:《破天荒》,作家出版社,2008,尤其是第九章和第十章。

^② 如周克冰:《禁区内的脚步——难以忘记的“渤海二号”事件报道》,载《新闻爱好者》,2002(3);程金福:《渤二事件媒体报道新论》,载《新闻知识》,2008(2)。

^③ 辛文彬:《报纸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载《新闻战线》,1980(11)。

^④ 海洋局党委中亦有人反对在报上宣传什么“英雄事迹”,但随即受到围攻,甚至被指责:“为什么老是同党委唱反调!”张以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见《不沉的上海》,55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⑤ 张南:《报忧不等于抹黑》,载《新闻战线》,1980(11)。

^⑥ 辛文彬:《报纸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载《新闻战线》,1980(11)。

^⑦ 叶剑韵:《新问题和新答案》,载《新闻战线》,1980(11)。

后处理过程中，因感觉存在罚不当罪等情况，《工人日报》自1980年五六月份起就多次跟进报道。由于时间上比较接近，又都涉及特定政府管理部门（石油部和煤炭部），特别是都涉及安全生产问题，这次为工人说话的报道，可谓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预演。^①

到1980年7月下旬，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交中纪委处理。当时新闻界仍有人主张为稳妥起见，还是等提出处理方案后再报道。但是有几家媒体没有这样办。作为负责任的新闻人，他们早已在酝酿如何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披露此事，所以“一得到党中央批准可以报道的消息”，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就各显神通，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报道的大合唱中。^②

二、新华社内参急报

众多媒体中，新华社是最早以内参形式将此事急报中央的，随后亦参与到公开报道中来。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就是由该报记者与新华社驻天津记者联合采写的（当时该报在天津没有常驻记者）。

在新华社国内诸分社中，第一篇被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内参就是由天津分社写的；此外天津分社还连续为《人民日报》撰写过3篇重要社论，并获总社颁发的“突破评论关”锦旗嘉奖。而在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中，天津分社亦有不俗表现。记者夏林等先后进行了深入采访，发内参和公开稿30多条，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③

夏林在天津分社工作了二十多年。其间采写过大量公开稿，也采写过上百篇内部调研报告，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并多次引起高层重视。有的调研报告还被国务院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全国。正因有多年积累，夏林对各种新闻线索非常留意和敏感。渤海二号事故发生后，他和分社记者杨继绳是“闻讯后最先赶到现场的记者，也是在第一时间最先内参急报中央的记者”。这篇突发事件内参的内容，在高层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然后便是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长达半年之久。^④

1980年7月，新华社总社指定夏林与《人民日报》记者合作，写出披露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第一篇公开报道。这篇不同寻常的稿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播发”。7月21日发稿，22日见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生产工作 违章指挥蛮干 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接下来他们又对这一重大新闻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夏林在一个多月时间写的内参、公开稿，“就达13篇之多”。^⑤

7月22日，新华社总社对外部用外文对国外播发了夏林等采写的新闻稿《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播出后很快就被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西方通讯社向全世界转发。26日，夏林采写的关于遇难职工亲属张彩霞的报道《不能忘记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以群众来信形式登载于《人民日报》头版。见报后有中央领导亲自打电话到报社总编室，询问报道的产生过程，表扬说：“记者发来的这篇文章很有力量！”此后他又采写了多篇报道。9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夏林采写的最后一篇相关报道《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与7月22日那篇披露报道同样的位置登出，为这一轰动事件的报道划上了一个句号。^⑥

^① 后来渤海二号处理过程中，关于这次煤矿事故的一份批示，确实成为扭转形势的关键契机。张以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66页。

^② 胡甫臣：《事故报道的新要求》，载《新闻战线》，1980（11）。

^③ 《新华社天津分社简史》，http://www.tj.xinhuanet.com/misc/2009-01/14/content_15452311_2.htm。

^④ 夏林：《岁月如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札记》，22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⑤ 夏林：《岁月如歌》，227页。

^⑥ 夏林：《岁月如歌》，225~264页。

在这次报道过程中，除了单独采写外，夏林还与分社同事杨继绳、杨复保等合作。杨继绳此前就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内参与公开报道。获悉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发生后，他和夏林在第一时间去过现场，后来在报道中也多次合作。比如1980年8月11日采写的报道《海洋石油工人要求 搞好海上安全生产 加强海难救生工作》，就是他们合作完成的。

杨复保也是天津分社一名很有作为的记者，写作的内参曾被中央领导批转过。他和夏林在业务上也有过合作。比如1980年9月2日的报道《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就是他们合作采写的。

夏林等采写的这一系列内参和公开报道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尤其是公开报道稿还得到包括新闻界同行在内的广大读者的注目。

三、《人民日报》记者述评

新华社得采访之先机，《人民日报》也不甘示弱。除了前引7月22日那篇报道，当时还配发了不少消息和评论。而从时代氛围和社会影响看，尤不容忽视8月24日那篇记者述评《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关于此述评的写作过程，以往主要依据时任副总编辑丁济沧的回忆；近年来，当事人王黎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供了一些更为细致的说法。

丁济沧回忆说，1980年8月23日，他从一位老战友那里了解到石油部内正在争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从根本上总结教训。这位老战友还透露，中央书记处已于日前督促石油部党组做出深刻检查，并拟撤销宋振明的部长职务。这些情况引起丁济沧的注意。报纸的批评如一石投水，在石油部激起了思想波澜，作为新闻人他深感欣慰；但同时也认识到：“不足之处是报纸批评没有对准石油部指挥失误的思想根源”。当天中午，他找到了较早报道这一事故的本报记者李和信，以及了解实情的《工人日报》记者牛风和商量，先到石油部了解情况，再研究如何深入报道。他强调有关重要情节还须调查核实；稿子务必赶在国务院督促石油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前发表，以促进中央精神的落实。记者述评发回来后，丁济沧与另一位副总编辑商量明日是否见报，对方表示如内容确凿、分析准确，由丁定稿。丁又担心，中央党报公开批评国务院所属一个部的工作会引起什么影响，继而又想，报纸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只要事实确凿，就不应有什么疑虑。经仔细推敲，文内只一处提到宋振明向国务院签发的报告有不实之处。文章最后提到人们盼望肃清“左”的流毒，标题亦定为《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丁济沧认为，经过这样的修改和处理，“既真实准确，击中要害，又与人为善，留有余地”。^①

近年来，当事人王黎江又为此提供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他说，是自己在“亟待深入报道的关键时刻，受命连夜赶到天津，突击完成《从渤海2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这篇记者述评的”。^②

1980年8月22日下午5时许，王黎江正在工商部开会。副总编辑安岗突然把他叫出来，让他当晚去天津。安岗说已打电话请天津方面帮助准备住处，并让他明天去找已在天津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和信，协助王写一篇报道，题目叫《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他希望明晚能将报道通过电话传回来，以便后天见报。

安岗并叮嘱“要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新闻单位知道”。尽管并不清楚这一突击报道任务的背景，但王黎江当时就深感安岗这个“点子”出得好，不仅在报道深度上超越了《工人日报》，变被动为主动^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报道，解决了拨乱反正中的一个大问题。王

^① 丁济沧：《渤二事件与报纸批评》，见《人民日报回忆录》，244~245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② 王黎江：《关于1980年渤海2号事故报道的一封信》，见《耕耘录》，158页。

^③ 此前《人民日报》两次转载《工人日报》的有关报道和文章。转载本来是常事，但也说明在同一事件的报道上存在差距，所以王黎江称被“将”了一军。工商部负责人也表示：“我们在这次报道中，缺点还不少，如在新闻报道上，就有不如《工人日报》的地方”。参见《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意义在哪里：人民日报工商

去过大庆,接触过石油部的领导,他很清楚这些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创造了很多好经验,但也发现石油部后来被宠坏了、骄傲了。渤海二号事故的发生,以及相关处理中暴露的问题,足以说明这一点;也因此,王坚信“批评石油部的领导,正是对石油部工作的支持和爱护”。

王黎江带着一大摞剪报,匆匆赶往天津。第二天与李和信接上头,一起研究材料,理清了来龙去脉,理顺了情况。“文章”等于写出了一半,因为勿需重新采访,也勿需核对事实。根据已有材料,按照安岗给出的题目,王黎江等完成了一篇评述性新闻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对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普遍关心,广泛议论。但是,从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消息、评论、文章以及读者来信看,批评海洋石油勘探局比较多,涉及主要领导机关石油部的问题却很少,甚至有意避开。石油部的领导同志呢,也很有点讳疾忌医。

这是王黎江在火车上翻阅了大批剪报以后就考虑好的,可以把关键问题点出来。接着让事实说话,写石油部领导给国务院的报告如何谎报军情;为了推卸和逃避领导责任,又如何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等。最后则语重心长又顺理成章地提出:

粉碎“四人帮”将近四年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很多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石油部怎么办?现在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当时没有传真、网络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传递方式很落后。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王黎江等竟在电话中讲了近3个钟头。深夜11点多才发完稿子。

1980年8月24日,《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随后王黎江返回北京,从25日到30日一直列席旁听石油部局处级干部会议,但只写了内部情况,没再做任何报道。在与石油部长宋振明接触时,他感觉其态度比较诚恳,对报纸的批评表示感谢,但也强调“我们并没有把事故的原因,完全推到‘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上”。因为述评原稿谓5月29日石油部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主要推到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上”。但报上发表时,“主要”被改成了“完全”。宋这才有前述说法。^①

丁、王分别从各自所了解的角度,忆述了关于8月24日那篇记者述评写作的若干事实。尽管所说不尽准确,甚至彼此歧异丛生,但也有可以彼此参照、相互印证的地方,丰富了我们当时情况的了解和认识。

四、《工人日报》新闻分析

在这次新闻报道大战中,《工人日报》无疑是大赢家。因为现在一提及这次事故的报道,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份报纸。而《工人日报》在此过程中的表现确实也可圈可点。还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该报记者刘俊生就获悉,海洋石油局在有关报告中提出要大讲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提这是责任事故。经过认真调查,刘俊生给报社寄回了这些情况。编辑部经过多次讨论,决定请记者继续作深入调查,同时给有关领导汇报。^②

报社随后派出陈骥、牛凤和两位记者开赴天津进行调查。但是海洋石油局封锁消息,不予接待,给记者吃了闭门羹。该局有关领导还决定:“不发消息、不做报道。”这更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为什么不让发消息,不让做报道呢?就在《工人日报》记者去天津请求调查的同时,中央有关方面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这一重大事故进行调查。起初也遇到重重障

部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载《新闻战线》,1980(10)。

^① 王黎江:《胆识、气魄与竞争意识:关于彭加木和“渤海2号”事故报道的回顾》,14~16页,见《当代“老新闻”》,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关于1980年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的一封信》、《寻常的胆识与气魄:回顾安岗直接指挥的两次新闻报道》,见《安岗新闻工作60年》,158~165、237~24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② 《名稿档案登记表: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见《报刊管理》,1999(12)。

碍,经过多次交涉,联合调查组才得到允许进驻现场,开始调查。可是对于《工人日报》,海洋石油局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两位记者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回去后,他们跟副总编辑丁望说明了这些情况,特别谈到海洋石油局不配合记者调查,甚至做出决定:“不发消息,不做报道”。丁望听后很愤慨。这虽不属他分管的事情,但第二天还是拉上相关人员去了中南海。^①经过努力,记者们终于可以对沉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

到1980年5月,《工人日报》考虑进行组织报道。当时报社内部有人强烈呼吁,报纸要代表群众说话,应该公开报道。报社也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要报道渤海二号翻沉的消息。当时的确有些顾虑,总想等领导机关点头批准。这些顾虑主要有两条:一是公开报道这样严重而又未处理的事故还没有先例,报道的结果会不会使群众泄气,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二是事故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而问题却涉及石油部,有些人还在那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公开报道的阻力可能较大,事故的依法处理可能较难,担心可以善始而不能善终,报纸会陷于被动。^②

现在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顾虑,但当时的确如此。而且如果不是中央有关领导一直以批评等形式来干预、支持和鼓励,《工人日报》的这些报道要出来还是很难想象的。1980年5月,薄一波在和报社领导的一次谈话中说,他经常看《工人日报》,感觉报纸总是跟国家经委跑,很少看到反映工人权利和工人意见的报道……薄一波特别提到:“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这样正气就没有了”。^③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听取劳动保护情况的汇报时也讲到,他对《工人日报》有意见,只跟着经委走,只讲抓生产,不注意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万里还说:“《工人日报》要代表工人利益,要批评官僚主义,但要准确”。6月20日,在一次会议讲话中,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等事件。他说《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在内”。如果掩盖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具体到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处理,万里说:相关责任人当然要坐监狱;事情“搞清楚了,要在《工人日报》上大干”。^④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日报》增强了围绕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开展批评的勇气,为此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报道组和领导小组。刘俊生负责现场采访,工会部记者陈骥与经济部记者牛凤和拿着天津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去调查核实。这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明显可以感觉到报社领导和记者对于渤海二号的采访开始“硬气”起来。陈骥曾在石油系统工作过,比较了解情况。那时石油战线鼓励职工冒险作业,只讲生产,不顾安全;只要求服从指挥,不问决策是否科学。陈骥与牛凤和找海洋局的职工座谈。他们反映,事发后局里要求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还要求统一思想,不许提“事故”。^⑤

终于可以报道了。报社又考虑,怎样才能把这次报道搞好?记者们采访时发现,事故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经查清了事故的直接原因和责任者,而且“首都各报也在采访”。考虑到事故本身的报道,新华社会发出统一的消息,用不着花费更多气力,报道组决定调整方向,把力量“着重放在揭露造成这次事故的深刻原因上,使大家从这起重重大事故中引出积

^① 谭云明:《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20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② 工人日报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组:《要有向群众讲真话的勇气》,载《新闻战线》,1980(10)。

^③ 报道后,薄一波说:“这次你们工人日报的路子走对了,就该这么办”。见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工人日报四十年》,111页,北京,工人日报社,1989。

^④ 《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载《报刊管理》,1999(12);李宝瑾:《继承与超越》,35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万里的这两次谈话也有6月12日和16日之说,见工人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工人日报大事记》,430页,北京,工人日报社,1989。

^⑤ 陈骥访谈,转引于《渤海二号事故追责》,载《新京报》,2008-11-25。

极的结论”。为此,报道组研究了调查组的报告,还访问了调查组的部分同志,认识到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其背后还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想。这种“左”的思想还超出了石油部,甚至和个别更高一级的领导人有关。对这些情况,要不要在报道中予以揭露?如果报道中光是涉及石油部某些领导人的一些“左”的口号和提法,而不涉及个别更高一级领导人的一些“左”的说法,实际上难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之讥,也没有揭露出事件的根源。

经过反复考虑,报道组感到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职责,“要有向人民讲事实、讲真话的勇气,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能钝刀子割肉”。也许有人会指责这是“砍旗”,但人民会支持披露真相的报道。这种想法得到事故调查组的热烈赞同,他们为报道组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确凿的材料。^①

一个月调查核实,一个月撰写稿件。1980年7月,两位记者交上一篇消息稿,一篇新闻分析文章。稿件写好后,送到天津市劳动局与总工会审查并获通过。陈骥后来坦言,稿件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否则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出消息稿《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同时配发长篇新闻分析文章《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首次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真相和石油部主要领导的错误态度与做法公布于众。那篇新闻分析一经发表,就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渤海二号事故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工人日报》又连续发了6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发表有关消息、通讯20余篇。8月25日,报纸登出《石油部应对渤二事件做出回答》,点名批评了石油部长宋振明。

后来评比好新闻奖,《工人日报》关于沉船消息的新闻稿有幸上榜,并得到“事实胜于雄辩”的评价。对此,亲历其事的陈骥颇为感慨。他说,这次系列报道中,我们花了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的那篇为什么会发生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分析文章没有获奖,倒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新闻稿获奖了,“这使我们很感意外,也很感遗憾”。后来听说,这篇分析文章没有得奖,是因为有人提出其中几个事例存在不实之处,所以选了那篇消息稿为“获奖好新闻”。

^②

余论

各报之外,广播媒体亦值得注意。因为沉船事故披露和报道后,不少人是通过广播在第一时间获悉相关消息的。海洋石油局的一些职工在7月22日早晨听完两次广播后,就开始议论纷纷。“下午还不到来报纸的时间,各处收发室已经拥挤不堪”。很多人说,《工人日报》等所载的文章反映了工人的心声!^③

各报之所以能反映工人的心声,很大程度上又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当时就有人指出,“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这次报道”。因为如果按常规办事,事事靠领导关照,遇到一个困难就后退一步,那么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就会出不来”。也因此,当时就有人敏锐指出:这次报道“有许多营养可以吸收”,特别是“在新闻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可以总结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还有人建议,《新闻战线》杂志可以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次广泛的大讨论,借此总结经验,推进改革。如此也许有望打破一些新闻报道中的条条框框,甚至还可能“开创一个更新的局面”。^④

^① 工人日报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组:《要有向群众讲真话的勇气》。

^② 陈骥:《获奖固可喜 教训要牢记:关于渤海二号事故报道获1980年全国好新闻奖的回忆》,载《新闻三昧》,2007(1)。

^③ 《名稿档案登记表: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载《报刊管理》,1999(12)。

^④ 《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意义在哪里:人民日报工商部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载《新闻战线》,1980(10)。

《新闻战线》也确实从善如流，随后在新开辟的“坚持实事求是，搞好报纸批评”栏目中，刊发多篇文章讨论“事故报道的新要求”、“批评性报道的正作用”以及“报忧不等于抹黑”等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新答案”。越来越多的新闻人也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思想僵化，而“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由此揭开了当代中国新闻史“新的一页”。^①

说它揭开“新的一页”，是因为渤海二号事件的披露与报道，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尤其在批评性报道方面，至少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失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②1980年10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中纪委对在任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喝不付费用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的消息，并就此事发表评论。紧接着，中央有关领导在11月份也表示：在把事实核对清楚，并同领导部门商量的前提下，可以在报纸上点名批评领导干部。^③可以说，这样一些情况的出现，正是得益于此前的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特别是由此开创的比较宽松的新闻舆论环境。

限于目前可获得的材料，对于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披露与报道，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情境乃至多面的社会影响，还有很多细节不太清楚，仍须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比如，王黎江提到当时各报之间围绕相关报道的新闻竞争，厘清此点有可能为我们展现一副更加鲜活、真实特别是充满动态感的新闻场景。又如，夏林提到了内参，惟其具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及过程则语焉不详；还有人注意到高层领导如万里、薄一波等相关谈话对此事之披露和解决的影响。如何恰当地分析和评估这些因素，显然亦关系到对整个当代中国新闻历史图景的勾勒。凡此，仍待有心人继续努力。

^① 参见《新闻战线》，1980（11）。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3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③ 王任重：《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4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

新中国与新文化 ——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语境为例

New China and New Culture: The Context for the Creation of Music

Dance Epic “*The East is Red*”

黄卫星^①

中文摘要：经济建设的激情、政治认同的想象、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化生态的壮美，共同汇聚成前新中国十七年的时代语境。本来，激情、想象、革命和壮美是融会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属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将它们分开阐述。所以，需要说明：革命，唯有革命精神，才实质性地贯穿于激情、想象和壮美之中。因为，有了激情，革命才得以发生；因为有了想象，才有革命的前提；因为有了壮美，革命才如此富有美感。革命带来不断滋生的激情、想象和壮美，革命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关于社会主义的激情与想象、革命与创新，一直影响着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直到现在，执政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也将社会主义的这种激情和想象、创造和壮美作为宝贵的精神传统来凸显。

关键词：新文化；时代语境；激情；想象；革命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eventeen-year pre-modern China is characteristic of four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pass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ag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revolution of the ideology system, and grandeur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To make it easier, the thesis goes to discuss them separately, though all of these four characteristics,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belong to economic,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respectively. Her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revolution, especially its spirit, runs through other three dimensions of passion, imagination, and grandeur. Further, passion sparks revolution, and grandeur determines its beauty, all based on imagination. Eventually, revolution gains endless vitality vice versa. As far as socialist art is concerned, these four factors exert a big influence on the writers, who create a deal of excellent socialist cultural products. Till now, it still highlights these four points as precious treasures when the ruling party establishes the long-term plan of promoting a prosperous socialist culture and developing a powerful socialist cultural society.

Key Words: New Culture, Historical Context, Passion, Imagination, Revolution, Grandeur

^① 黄卫星，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项目编号：09AXW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自黄卫星主持的子项目《新中国文化传播》。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于1964年,1965年改编成艺术电影,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十七年,燃烧着社会主义的激情、想象、浪漫、创造,这种精神状态和现实活力绝然有别于建立在利益和实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而社会主义重新燃起了一种新的对“尊崇”、“等级”、“神圣”的信奉和推举,如“尊崇劳动”、“工农大众是历史主人”、“劳工神圣”,这是一种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建立在财富、金钱、利益至上的社会结构基础,又有别于封建社会建立在以出身、血统、门第、权力为基础的等级社会秩序。社会主义赋予了普通劳动大众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赋予了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主体意识,赋予了他们书写历史的话语权力。这种以自由、平等、民主为象征意义的社会理想,激发了从积贫积弱、战乱纷争、颠沛流离中艰难走到新中国门槛的人们,普通的劳苦大众自然成为一个主要的群体,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出于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和厌倦,怀揣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种种期待和想象,也加入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洪流。

激情。经济建设的激情,喷涌在经济的速度、效率和结构上。在冷战格局及其所带来的冷战思维下,“超英赶美”的经济发展预设目标催化了跃进式发展,而后的“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八字方针,则确保高速奔驰的经济列车在自我完善的修复调控下,达到“多、快、好、省”的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灌注的激情,来源于对公有制结构的建构乃至孜孜以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具备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目的,还带来了政治上诸如平等、公正、解放等深远的意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意识形态、精神领域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来源于物质基础的不平等。马克思认为消除私有制,让社会从私有财产等解放出来,是解放工人、解放普通人的根本,“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得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①普遍的人的解放,除了首先是在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底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经济平等外,还意味着所有被各种力量支配的社会阶层摆脱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不合理现状。

想象。“想象”与未来相关,也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充沛的想象力,既表明社会充盈着理想,民众拥有想象未来的能力,进而充满着创造未来的冲动与激情,也体现着自身的“主体性”,能动地改变生活和世界。同时,想象跨越时空,形成某个群体共同的情感认同和意义旨归。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②,想象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源于这个群体在血缘、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共性,得以选择和强化,乃至有意识的虚构,从而使该群体产生强烈的认同,使之转化为民族(nation),进而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显然,安德森所阐释的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具备有别于物质基础的想象意义。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具体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想象,对于一个开创新政体的国家,尤其在其初始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构成保证政权平稳过渡的社会心理基础,一方面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结构对民众心理的召唤。对社会主义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对此充满了令人激奋的想象,执政者对此也充满了令人自豪的想象,并且通过文化的力量交汇交织在一起。而正是文化的力量——各种政策制度、宣传口号、艺术作品、媒体文化、民间阐释等,使得社会主义政治的想象,乃至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想象,变得深切、深刻、深远,并且化为日常生活点滴体验。

新中国的人们如何想象一种新的未来?如何想象一个集体指向、共同认同的政治图景?基于对中国近百年屈辱的民族历史刻骨铭心的疼痛感、清醒深刻的认识与强烈渴望“翻身”、“解放”的愿望,在共产党长期关于革命造反的政治话语阐释下,广大民众自然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思想观念具有变革乃至激进意识和想象。想象——民众的政治期望与共产党的政治图景相互映衬、相互激发,共同牵引着现实政治不断迈向一个脑海里更加美好,更加公平正义,更值得追求的世界图景。

如果说,传统乌托邦仅仅只是一种彼岸的幻想,那么,社会主义的想象则是一种通过具体努力在此岸实现乌托邦的想象。想象不仅是目的,而且还有达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共产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激进人文主义的综合体。^①当下,乌托邦似乎成为一个贬义词,有人甚至将乌托邦同极权政治建立某种因果联系,将人类的灾难归咎于乌托邦。但是,正如莫里斯·迈斯纳(也可译为“莫里斯·梅斯纳”)所指出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国民党政权……所具有的显著的集权主义特征显然比任何乌托邦的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因此,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迈斯纳坚持认为,乌托邦对于未来的幻想的作用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还提供了代替现存社会秩序的东西。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设想另一个与现实根本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这种能力显然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②

激情和想象,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又同革命精神相契合。席勒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参与政治,最终会发现只有美学才能解决问题,经由美,人才能达到自由。其意思也正基于革命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对理想的讴歌来壮行。我们不难理解“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活跃的艺术家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们的作品也无不充溢着浪漫主义的精神。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张扬浪漫主义“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将浪漫主义文学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作为一场伟大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需要浪漫主义精神,需要浪漫精神所蕴含的革命激情,“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谛克”(蒋光慈语)。有意思的是,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毛泽东1942年《讲话》所确定的文艺指导思想,都不断在强调和推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浪漫主义携带的激情、想象、冲动,虽然是革命的元初力,但革命的持续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性,必须以现实

^① 乌托邦主义和乌托邦式有区别。伯尔基谈到:“我认为马克思归结乌托邦社会主义是零碎的社会主义,构想从实际到理想、从底层、从‘社会’、从个人态度和生活方式出发,这样一种改变的渐进过程。没有革命的‘大爆炸’,没有先进精英领导的‘震撼’。第二,它意味着和平的社会主义:方式和目标都是非常‘理性的’,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是适当的。每一个健全的人都能够且愿意被新社会相对于旧社会的优越性说服;社会主义对每个人都是最‘有利’的。这一和平的方面是与零碎的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社会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实行它,通过那些吸引人的例子——一个人和一些群体——那些已经在他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发生改变的人。第三,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它的观点上是父亲般和家庭的,聚焦在一般的‘人’,具有善良一项和自然愿望的男人和女人上,而不是社会中的确定群体。也就是说,当作者通常在这个标志下思考并不是忘却阶级或他们之间社会冲突,他们只是并不将社会主义当做工人阶级专有的事务,也不认为社会冲突的激烈化必须先于政治变迁,或新社会将实际地从阶级的敌对发展中诞生出来。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无论如何乌托邦社会主义没有变成‘革命的’,恰恰正如因为同样的原因它没有成为‘科学的’:对现实的变化——或辩证法——视而不见,它对(必然)产生于现实冲突的未来也没有清晰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表达中,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幼稚的’。”具体参见[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13~114页,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20页,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有关中国革命和乌托邦的问题,可参考此书的某些观点。

主义的态度应对各种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后,革命组织内部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系,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就显得不合时宜。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是一场以解放最广大劳苦大众为历史使命的革命,其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等革命胜利的法宝,都是基于这种政治立场和时代使命而来的。当然,激情、想象、革命等感性力量,仍然是“革命”时代所需要的要素,毛泽东在1950年代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就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

革命。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人的主体性自觉、主动的发挥,是以自我为改造和革新对象的精神实践。人,这种“宇宙之精灵,万物之灵长”,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传统惯性、陈旧习俗、自我遮蔽、认识盲点都能够阻碍个体思想的自我进化和新陈代谢。每一个庸常之人,是无法都具备启蒙思想家那样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对自身思想观念中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进行反省和自我改造。虽然人的一切思想改造和精神革命,最终还是得益于个体主体性的激活和张扬,但是,这种纯粹依赖主观内部力量的过程,无疑是漫长而且充满不确定等不可控因素的。在一个同仇敌忾迎来了民族自由独立的时代,在这种集体意识高涨的年代,新中国的广大人民对基于种种现实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经验,深刻感受和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和“家”类似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理想社会主义宏图满怀激情和向往。此时,他们需要也心甘情愿将包括思想在内的种种“旧世界”托付给执政党进行一体化的领导和组织,摧毁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世界。哪怕是疾风骤雨式的摧枯拉朽,哪怕有许多的阵痛和不适应感,可一想到那即将迈向的理想未来——极具道德上和美学上的优越性的理想蓝图,思想改造、灵魂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迷惘、退缩乃至怀疑等负面情绪,就会在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洪流中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伊始,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大规模兴起,不但没有遭到多少抵制,而且还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毛泽东等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认为,思想革命不但是首位的,而且是难度最大、时间最恒久的。在对形势预判稍微紧张的时期,信奉两种思想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似乎总是存在。而马克思虽然也认为消除私有制首先是思想上的,其次是行动(政治运动)上的,但他认为指向政治的变革是“艰难而漫长”的,“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足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①新中国前三十年对思想文化革命的特别倚重,将文化革命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因此不时呈现出思想改造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经济不但可以从中寻找原因,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力量,也成了僭越思想文化的某种支配性力量。

人的双重解放,包括人的社会现实的解放与人的内在的审美解放。社会现实解放伴随着经济的解放(消除剥削)和政治的解放(消除压迫)而实现,而人内在的解放,首先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紧密关联的审美解放,“人的感性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因此,本体论上的审美革命,首先是人的感性的审美解放”。^②马尔库塞有时把人的感性称为主体性,认为感性在人格结构、心理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感性以人的内驱力、本能结构为本源,通过人的灵性、激情、想象、冲动、潜意识、无意识等感觉力量显现出来。马尔库塞指出,主体的历史的实际表现固然是受其阶级地位决定的,但阶级地位并不是感性个体的命运的基础,并不是那碰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命运的基础。阶级斗争并不总是能为人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负责,满足与爱欲、死亡等本能的趋同才具有真正的力量。“在原欲转化为爱欲的过程中,生命本能发展了它们的使人产生美的享受的秩序。同时,理性也变成能使人产生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刘小枫:《诗化哲学》,第六章《人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解放》第二节,
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ought/shzx/02-6.htm。

美的享受的了,以致它能在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的名义下包括和组成需要。审美经验的根源重新出现——不只出现在艺术文化中,而且出现在为存在本身进行的斗争中。”^①马尔库塞再次重复了席勒和早期浪漫派的这一思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得经历一场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马尔库塞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为,现实社会的革命须以心理革命为基础。只有先经过心理革命,造就出有新的感觉的人,现实社会的革命才可能完成。所谓心理革命,就是本能结构(需要系统)的审美变革,感性的审美生成。其目的就是要把想象、浪漫、诗意、意象、激情重新引入人的感觉、发展出一种新的感性。“虽然主体性(感性)表现为个人的力量,表现为个体有限生命的特殊的历史,以及激情、欢乐、悲哀等经验的特殊历史,但却具有政治价值。它不是生产力,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②

如何把阶级意识这种宏大叙事的历史意识同个体的感性体验结合起来,从而化作一股巨大的社会革命力量,是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所致力的一件颇为成功的文化工程。社会主义激情和对社会主义的“想象”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化发生期的核心“动力”,“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的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③。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工程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乐观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既成为整个文化体制规制下的文艺工作者和传媒的正统言说方式,也形成以“壮美”为主色的美学风格。

壮美。壮美是种美学范畴,和“柔美”相对。壮美作为一种内在精神,体现为刚毅坚强的品格,充满阳刚之气,具备强大的抗压力以及强烈的自我超越性。壮美之壮,体现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外界的压力、折磨和考验中,“虽有九死而未悔”、“久不改其志”,从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壮美的美学范畴,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性实现。审美主体在壮美的文艺产品目前,往往觉得对象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自身力量的确证。人在与矛盾对象的冲突中,通过自身主体性的激发,成为自然的主人,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主人。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正是社会主义的激情、想象所建构的,也是在革命、改造和不断自我超越的历史行动中形成的。这种时代风尚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影响和渗透在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及其形式中,与社会主义初期的整个历史语境相适应,和社会脉搏相应和。这种文化、文艺领域的壮美,就是体现在艺术作品和文化产品中的阳刚、雄浑、豪放、乐观、积极、奋进等风格,这是中国古代美学家文论家所赞赏的“风骨”。文化总是在与社会时代彼此之间不断的互动中,达到某种动态的平衡。壮美这种美学范畴,构成了十七年文艺乃至整个前三十年文艺、文化的主旋律、主色调。这时期产生的文化产品,大部分给接受者以恢弘豪迈的美感,使人感到自身的强大,尤其是作为劳动者的光荣、伟大和自豪。

文化既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表征,又是社会化的产物。作为历史选定的某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文化话语”,当然离不开无产阶级的主体想象和伴随着这种想象的历史行动和社会实践。“话语”本身兼有内指向(语言、想象)与外指向(实践、行动)的双重指涉特性,这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文化话语”想象域与行动域既同时属于两个领域,又能够彼此“自然”地连通。值得注意的是,想象不是纯粹依赖主观意向凭空产生,而是来源于现实种种复杂关系的交互纠结。蔡翔^④把1949—196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解释为一个不断回应或询唤其原初革命理念的“历史运动过程”,一个受制于国际冷战格局、国内各阶级利益博弈或记忆冲突的“空间场域”,一种派生着各类矛盾因素甚至相反

^①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英文版,204页,1955年。

^② 刘小枫:《诗化哲学》,第六章《人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解放》第二节。

^③ 蔡翔:《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④ 具体参见蔡翔:《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力量的生产性“装置”。从而把“社会主义”这个冷战思维下生硬刻板的概念，从各种本质化叙述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了“社会主义”概念原本的活力和立体，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连接文艺与政治、想象、行动等多种关系视角以及话语的连接方式。关于社会主义的激情与想象、革命与创新，一直影响着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直到现在，执政党依然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也将社会主义的这种激情和想象、创造和壮美作为宝贵的精神传统来凸显。胡锦涛在2011年中国文联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说道：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以昂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感染着亿万人民，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惯性使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彰显使然，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需要使然。

经济建设的激情、政治认同的想象、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化生态的壮美，共同汇聚成前十七年的时代语境。本来，激情、想象、革命和壮美是融会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属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将它们分开阐述。所以需要说明：革命，唯有革命精神，才实质性地贯穿于激情、想象和壮美之中。因为有了激情，革命才得以发生；因为有了想象，才有革命的前提；因为有了壮美，革命才如此富有美感。革命带来不断滋生的激情、想象和壮美，革命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这里的“革命”，绝不是狭义的“革人之命”的暴力斗争，而是广义的改变、改造、变革、创新、超越。建国后的种种“革命”，并不全是狭义政治化话语，其实质和现代性的自反性、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观、矛盾统一体的辩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探索等性质往往有机地吻合在一起。唯有如此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精髓，才能拨开云山雾障，看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的核心。随举一例：1957年，毛泽东先后视察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给全国人民描绘如下社会主义发展进程：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用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为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这里，革命和建设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建设同样是革命工作，也需要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总之，凡是属于新事物有所“建设”、旧事物有所“破坏”的事情，就是革命的。（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客观困难，艰苦卓绝努力奋斗，就是革命精神。所以，这个时代，到处洋溢着革命精神，各行各业都在从事着革命事业。

为什么“革命”成为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主题？因为革命的存在永远来自矛盾的存在，矛盾是双方斗争达到对立统一的整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主体和主体之间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旧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解决矛盾，消除冲突，必然需要改变、改造、创造。革命，沸腾着变革的激情和能量，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如何认识，如何区分，如何对待，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问题的长期思索对象之一，也是毛泽东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一直形成的涉及矛盾斗争问题

^①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1-11-22，来源：新华网。

^②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的思索。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思考这些问题,如他自己所说的,“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①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其主要观点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解决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之举,包括工商业的改造、合作化运动等。而当认为生产力不符合生产关系的时候,也要加大发展生产力,例如大跃进的提出和出现。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新中国前十七年的路线、纲领、政策、措施的不断变化,无不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及其调适密切相关。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政治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为了正确认识这个矛盾,应该首先科学地界定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同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毛泽东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所以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以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正是由于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和区别,所以在矛盾始终存在的前提下,斗争(革命)始终存在,但具体什么人什么事是属于敌我矛盾或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该分别用怎样的斗争(革命)方式和手段解决?民主和专政该怎样防止彼此僭越?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广阔的社会运动中,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区别。在革命热潮涌动的激情岁月里,从行政管理到普通民众,也不太能够在每件事上都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尤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界定含混和嬗变(“皮毛论”占主导),知识分子的作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与体制的期望之间的同步或者分离,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解决矛盾所造成的矛盾性质界定的随意化和处理矛盾手段的简单化等等,都使新中国前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充满了复杂和艰难,成功与遗憾。

下面,就让我们循着历史运动的轨迹,来具体感受鲜活跳动的时代脉搏。

一、经济建设的激情

经济建设的激情体现在对现代化的执着追求、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的豪气、躬身自省的勇气、创造伟业的豪情诸方面。

现代化的执着追求。对现代性的追求,是近来以来突出的社会发展主题,现代性思想的萌发和成形、吸收和借鉴,一直为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所努力追寻。现代化是从民族国家具体实现现代性的实践和历程之角度说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①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具体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42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15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图式和具体方案。尤其对于一个拥有几千年传统文明的东方国家、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将实事求是作为理念原则的政府来说,追求现代化不仅体现了对于现代进步这种普遍价值的强烈认同,而且反映了对国家发展战略、纲领、思想和政策等方略的独立自主,也就是所谓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9年11月5日,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时,阐释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着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并提,作为现代化方案的重点内容,涉及经济、科学、文化三个方面,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明确为四个领域的“四个现代化”。1963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十四周年招待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不是一个梦想,实现这种梦想需要全国人民的建设激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克服困难,迎难而上”。^②不久,周恩来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个意思: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③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有执着追求的信念,有艰苦奋斗的激情,这些主观因素的彰显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是激情和梦想若变为理性与光荣,还需要相匹配的客观条件。对此,执政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初步制定了现代化的时间表,显示了现代化激情背后的冷峻和智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④。向全国人民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激情。

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超凡的毅力激情不能持久,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激情最终只能化为空洞,只有全国人民共同凝铸了这种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才能谱写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1956年在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亿万农民、工人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广大普通劳动者成为历史的主体、国家的主人,具有了劳动的地位和生存的尊严,从而极大催发了他们的激情和动力。1957年3月19日,周恩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阐述艰苦奋斗、和平建设问题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国家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尽管有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有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有了和平的环境,那还是会错过时机或者浪费力量的。还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当然革命成功是艰难的,但现在建设就更艰难。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⑥鼓励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是弥补客观条件不足的关键要素。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82页。

^③ 周恩来1963年11月15日、16日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时的讲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9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691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360~36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7页。

的总路线。激情化为激进，建设作为革命，大跃进运动由此轰轰烈烈爆发。1962年3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最后号召：

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需要进行长期的奋斗。过去，我国人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现在，在我国人民面前，还横着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我们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再用几十年时间，把这两座大山搬掉。^①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用了“愚公移山”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此次，“愚公移山”就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坚韧不拔、不懈奋斗、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独立自主的豪气。冷战格局下，中国的独立、生存与发展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封锁压制，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道路既是国际环境逼迫使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尤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格局下，实现经济腾飞，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仅是一项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而且还赋予了两种体制优越性竞赛的政治色彩。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提到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他说，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苏联正满怀信心地要在十五年内各种重要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人民也要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②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已经烙下深深的伤痛，这种伤痛成为一种警觉鞭策的力量，激励年轻的共和国前行。周恩来于1959年6月26日接见苏联专家时，这样谈及大跃进问题：中国搞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担负起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应当担负的任务。^③帝国主义的压迫，犹如年轻共和国身上的梦魇，也由此激发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激情，这种激情还承担着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共同反抗压制的国际主义情怀与责任。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最高阶段——共产主义，光芒万丈，似磁铁般吸引着共和国迈向这一“大同世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初期中国这样评述道，“中国已经显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能出现共产主义革命。它已经实施激进的土地改革，而且很快通过农业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它在朝鲜战争中，已经受了美国军事力量的考验。毛泽东承诺将很快赶上美国，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对手——一个是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专政——那么它们之间的竞赛就成了冷战的一种外围翻版（尽管印度选择了不结盟）。中国，据说是显示了共产主义在发展方面的功效。”^④

躬身自省的勇气。年轻的共和国，浑身灌注着前进的亢奋，充溢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试图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独特道路，体现出对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强国的执着追求。高扬的社会主义激情，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同时也往往难免盲目热情、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12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39页。

^④ [英]梅格纳德·德赛著，《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齐全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2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背客观规律、欲速则不达。大跃进后期的“共产风”、“浮夸风”、“大炼钢”等激进的主观化倾向,渐渐暴露出一些致命缺陷。可喜的是,高速奔驰的列车虽然一时难以刹车,但遇到问题时,往往会意识到要减速排查故障,经济发展的激情背后也充满着躬身自省的勇气。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做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帐,坚决退赔。不久,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强调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后来召开“七千人大会”^②的目的,也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这种躬身自省的勇气,和现代性的自反性、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的激情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探索,无不紧密的交集在一起。

创造伟业的豪情。从一穷二白的建国前到六十年代,神州大地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教育卫生保障等速度,都在发生着巨大的飞跃。1959年10月6日,为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作的《伟大的十年》一文发表。文章总结了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我们已经奠定了飞跃发展的基础,并且找到了继续跃进的道路了。”万丈豪情,伴随着人民群众积极的创造而产生,虽然大跃进期间经济有过短暂受挫,但民众的激情丝毫不减。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官方和民众对过分主观化的做法有所反思。后来经过几年调整,1962到1965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国民经济逐步增长,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国民经济接近并达到新中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克服困难,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勇敢前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许多奇迹般的业绩如红旗渠、原子弹等,都在这个期间创造出来。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幻,超级大国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面前,中国人民毫不畏惧,坚持正义、坚持和平,出色地应对了挑战。^③

二、政治认同的想象

政治认同的想象,在共和国体现为自身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一种创造,没有照搬苏联的现成社会主义框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所以,这种政治认同的想象,更多是立体的、全面的一种构想、一种理想、一种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想象,时刻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政治危机的警惕性,力求保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纯净性,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阶段——共产主义早日实现的迫切性。

政治危机的警惕性。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经济领域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的促进或者干扰,而政治领域的变革必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对社会主义政

^①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

^②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下册》,669页。

治认同的某种想象,指引着经济措施,其中有着交织不清的反复和矛盾。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的需要,首先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干扰,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想象的一个安全阀。表面看来,政治危机的警惕性似乎显得保守小心、如履薄冰,与社会主义的激情仿佛背道而驰。然而,正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政治想象的激情,所以更加以警觉的态度抗拒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破坏和干扰。同时,强烈的政治诉求,有时影响到通盘考虑的可持续性发展。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的反复和政治判断的进退纠缠在一起,使经济和政治的面貌显得变化多端。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了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发表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会”给吹掉了。讲话还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矛盾,并肯定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当前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在毛泽东看来,国内的政治形势尚未稳定,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危险还存在。在体制内,首先要确保政治路线的统一性,党内的路线一定要统一。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为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对思路和政策须时时躬身反省,纠正错误,而一切前提是某段时间全党必须统一于一条路线。既要跟右派进行斗争,还要跟党内的右倾思想斗争——这种政治取向,获得了不少领导人的认同。“至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偏差、缺点,那是我们执行总路线中的毛病,不是总路线的毛病,是我们违背了总路线。”^①

政治体制的纯净性。坚定拥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基础。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纯净性?如何防修反修?自然成了政治想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冷战”阴影下的中苏论战乃至分裂所引爆的意识形态危机,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命题。“以美苏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垒,其充满矛盾不谐之文化意向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道路之间的紧张对峙,加倍地投射于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想象政治与社会实践”中。^② 1963年9月,为了阐明同苏共的分歧,《人民日报》、《红旗》联名发表经中共中央讨论的评论文章。1964年7月,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并定题的“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全面总结中苏论战的国际影响和国内意义,并将问题聚焦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苏两党展开公开论战,对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基本走向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梅格纳德·德赛对此这样评述:“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发生了争吵。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做法十分恼火。对中国人来说,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者。毛泽东变成了共产主义教堂中第一个新圣像,他被抬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中国比苏联更不妥协、更革命。这种分裂对粉碎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垄断产生了健康的影响。更多的旧的马克思手稿被陆续出版。毛主义是反官僚政治的,比苏联的官僚体制更具有平等主义,更与土地有关。”^③“中国人当然厌恶这种修正主义。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45页。

^② 张炼红:《“红色经典”的想象政治与“革命中国”的认同困境——以〈沙家浜〉史事演义为个案》,转引自罗小茗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22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③ [英]梅格纳德·德赛著:《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齐全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24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泽东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边缘地区、从东方站起来。‘东方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词语，也成为一部北京歌剧的标题。”^①中苏论战后，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以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从此中国更加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政治理想的迫切性。政治认同的想象来源于对“社会主义”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的想象——公有制为基础以及平等、自由、民主，激情拥抱社会主义，渴望奔向共产主义，这种政治想象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五十年代后期，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作用，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不断加强，工农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进一步激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热情。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共产主义是人民“强烈要求平等”理想的直接产物，“它既是平等的共产主义，人民在道德价值并且生活条件上平等的共产主义；又是美德的共产主义，期望共同的善和人民的联合；还是福利的共产主义，声称共同体对个人的幸福负有责任；以及互助合作的共产主义，期望这样一个社会，在社会中为他人服务并不仅仅被看作和被体验为一种道德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的形式。而且它还是斗争的共产主义，以无情地扑灭种种社会罪恶、堕落。美德是在血污中诞生的。”^③共产主义，无论在当时是乌托邦主义还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就其政治想象的纯洁性而言是值得敬佩的，就其政治想象的迫切性而言是值得理解的。

三、思想意识的革命

对思想意识等精神世界的重视和建设，是中国独特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先天优越性。正如北京大学政治学学者强世功教授所说：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因为掌握了宇宙真理，且具备了为天下生民谋福利、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承担，而具有了“大本大源”，也自然能够“动天下之心”，领导人民革命。因此，“党”承担起了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使命，是政治的灵魂，而“国家”不过是“党”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器”，是“党”在天下大同实现之前的临时性居所。”^④

实现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赋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神圣政治使命感和道德救赎感。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外部世界，首先以改造内在旧世界为伊始，内在世界的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变革想比，具有现实的挑战性，且更具有战略上的长远性。1961年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精神生活总是超过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强大起来，或者不继续强大起来，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来威胁我们。^⑤那么，精神生活如何强大？

首先，格外重视思想改造。将思想改造视为一种革命，而且是最持久最艰难的革命。共产党建立以来，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思想改造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准绳。周恩来讲到思想改造运动问题时指出：思想改造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很好地开展。这个学习，也是集体的学习。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才会深入，才会与实际

^① [英]梅格纳德·德赛著：《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齐全社会主义的灭亡》，24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360~361页。

^③ [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10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④ 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386页。

联系。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因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思想。同时,学习必须和生活实际、革命实践相结合,要提倡参加实际斗争。^①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以革命的状态对旧思想予以斗争。

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消灭三个差别——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面都是关键性的。用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②只要矛盾存在,就预示着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有待完成,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顺利的保障。正如毛泽东1960年在领导干部会议发言中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实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全面完成,还没有真正得巩固,所以还必须进行整治思想革命。在革命转变时期不断革命,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曲折。从国家制度来说,整个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宪法中,我们一直说明国家有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③按照初衷,思想革命的目的和手段分为两种:治病救人和阶级斗争,两种情况似乎总是并列存在,但是具体时间下的侧重情况也可以不太一样。^④可是,民主和专政、人民和敌人,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在思想意识革命这一复杂的领域中,很难界定和区分,有时甚至在人民内部和思想领域,也采用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如反右运动。^⑤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思想意识的革命,同时分布在诸多领域。首先直指党内思想,净化党内作风,整风运动深入而普遍。整风毫不避讳,痛击政治肌体内的顽疾——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⑥不遮丑不掩瑕,来源于健康自信的执政心态,激励于社会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可见一斑:七八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使一些人骄傲起来。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⑦“活到

^① 1951年11月22日,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96页。

^② 1960年初,毛泽东建议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月14日—25日,周恩来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二十三日发言,阐述过渡时期问题时所说。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88~289页。

^④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指出: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现在思想这样混乱,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明确宣布: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他指出,现在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讲话结束时,毛泽东要求各地党委把思想问题抓起来,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抓思想问题。具体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74页。

^⑤ 1957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分别召开十三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意见。总共一百八十多人讲了话,对中共提出了批评和意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爱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1957年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文章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61页。)1957年7月26日,国务院第五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以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提出制定劳教条例,对一些破坏纪律、长期拒绝劳动或无理取闹的人,虽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要送往边远地区强制进行教育改造。

^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⑦ 1957年5月12日,周恩来接见波兰、捷克的代表,在谈到党内整风问题时所说,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

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①党内整风运动,尤其对领导干部的整风运动更是严厉和苛刻。1963年,开展领导干部“三反”斗争(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其斗争重点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②。“五反”运动中,干部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共产党严厉整风亲自表率,为其他各行各业的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使思想意识的革命能够广泛的开展起来。

军队思想改造也是适应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显得颇为疾风骤雨。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③

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革命则显得温和得多,确切地说是积极的思想教育,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期望和要求: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有相应的基本认识、基本训练和基本功夫。德育方面,要建立阶级观点(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观点(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生产知识,学习他们淳朴的思想感情、语言和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革命观点(加强个人改造,反复教育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集体观点(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服从集体利益,以先公后私的原则安排生活)。^④对学生政治思想的要求、道德品质的要求以及价值观的要求等,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引。

最受重视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的“原罪论”。认为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过来,不可避免受着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影响。^⑤这些旧思想往往会导致做事出现偏差甚至错误,所以需要下决心改造自己。^⑥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⑦其二,知识分子的“有用论”。社会主义的知识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需要依靠知识分子。^⑧党内知识分子要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

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2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56页。

^③ 1951年12月1日,周恩来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讲话,报告抗美援朝形势和解放军开展思想改造问题,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他部门。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99页。

^④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向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问题的报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67页。

^⑤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75页。

^⑥ 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说:我们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封建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或多或少地与旧势力有联系,“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说话做事“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要把这些旧思想清除掉,“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⑦ 1957年11月11日,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谈到现阶段所有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取得胜利了,但是上层建筑、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不适应这个基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思想还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这就归结到一个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这还要经过政治思想上的几个回合才能解决。要在六亿人口中,在各个阶层中,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特别要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96页。

^⑧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昧和无知的命。搞这样的革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①“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②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③其三,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容易接受和参加革命,消极的一面体现为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所以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太容易。^④其四,政治学习和组织教育对知识分子是必要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分清思想上的敌我界限。^⑤其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持续的过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要和风细雨地进行”,“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⑥其六,人民立场的确立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基石。知识分子的立场要进一步从民族的立场到人民立场,再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尤其要在实践中加强思想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⑦

文艺界思想改造。这里特别分析一下1961年到1965年的文艺界思想整风。1957年7月14日始,文艺界开始整风,其中也伤及一些无辜人士,打击了部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和创造性。两年后,中央对此有了警觉和纠正,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正确的文艺工作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并且,

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①《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载《人民日报》,1956-01-30(1)。

^②1957年5月2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的建社四十周年纪念会的讲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

^③1962年3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不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报告最后号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67页。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一脉相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1962年的春天,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忘的。自反右派斗争以来,他们还未曾有过这样振奋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从而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④1957年8月8日,周恩来向外交部全体干部作报告,在谈外交队伍问题时,讲到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积极一面,这使他们容易接受和参加革命。但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三方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消极、落后、反动的一面,这是知识分子阴暗的一面,如果不自觉地进行改造,他们的阴暗面就会妨碍他们前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能把改造看得太容易。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简单是读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还要有实际生活的锻炼,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68页。

^⑤1951年下半年,北大汤用彤、张景铨、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9月24日,周恩来约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等开会,座谈京津地区大学师生如何开展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问题。在发言中强调:学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具体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81页。

^⑥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

^⑦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改造中,要使自己的立场逐渐“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一旦立场问题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结论,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的前途服务”。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83页。

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正措施,例如改变干部作风,甚至直言“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不赞成“乱戴帽子”。批评那些“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属于人民队伍,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同时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②周恩来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坦诚之心言之切切,让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极为感动。六十年代前五年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与这一时期的思想宽松无不关系。

四、文化生态的壮美

在共和国短短十多年历史中,社会主义的激情和想象,伴着革命的精神和魄力,开辟了举世瞩目的创举。毛泽东1958年满怀豪情地说道:“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他强调,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③共和国领袖描绘的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浪潮。为了更快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就要进行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大跃进,即使其中出现缺点,但跃进式发展的总路线鼓舞着全国上下。^④

革命,再革命;跃进,大跃进。

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拉开一场新的序幕,抒写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独特的壮美诗篇: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越是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亿万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奋发图强,改天换地,无私奉献,汇聚成鲜明的时代精神。为这个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雷锋、焦裕禄、

^①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讲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18页。

^② 1962年3月2日,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103页。

^③ 《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中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具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476页。

^④ 1959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国中央召开的省、市委文教书籍会议上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方面,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对国内建设任务,提出为了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要继续进行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实行大跃进,要大搞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更快地攀登科学高峰,掌握尖端技术,要有主导、有重点、有次序地按高速度按比例地实行全国一盘棋的计划,要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避免他们的一切短处。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70页。

王进喜、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姊妹……这些模范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成绩,他们的奉献精神、理想信念、观念情操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史》(集二卷)这样评述道:

人民群众逐渐树立起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共同价值观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中得到崇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及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这是在旧中国不曾有过的。^①

1957年是文艺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让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人士大为振奋,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成果。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②趁着这股春风,配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确定了文化革命(文化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许多的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开展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以及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③不久,大众的文化实践活动颇为丰富壮观,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文化产品波澜壮阔。

与此同时,文化领导权并未放松,对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方针——要进一步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注意吸收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工作。^④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指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提倡接近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⑤使文化界人士震动很大,也使这段时期大量出现的文化产品,更加突出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同时文化工作者积极下基层体验生活,参加实践深入创作。并且,鼓励文艺人才继续“人的改造”,进行“人的革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361页。

^② 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291页。

^③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467页。

^④ 1963年8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首都音乐舞蹈界提出了艺术创作上要进一步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方针。

^⑤ 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同年12月12日,他又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文艺情况汇报》所载柯庆施抓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批示还尖锐地提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对文艺的第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使文艺界震动很大,中宣部于1964年3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党组成员开会,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汇总各单位整风情况,写出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对文艺的第二个批示。这个批示在文艺工作中引起更大震动。

^⑥ 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

思想地位进一步加强。

在1956年至1966年间,文化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新中国文学园地的许多代表性作品产生于这个时期,如小说方面的《红旗谱》、《创业史》、《红岩》、《红日》、《三家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李自成》(第一部)等;诗歌方面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望星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散文方面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秦牧的《花城》等;戏剧方面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历史剧,如《红色风暴》、《槐树庄》等话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这一大批作品问世,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鼓舞人民,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的生动教材。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针砭时弊的散文、杂文。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成功,与执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有关,具体说来,一方面不断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一方面鼓励和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而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艺术家亲历过革命战争,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浓厚的感情、厚重的生活体验和自觉的价值认同。这些作品反映了建国后高扬的理想主义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貌和精神追求,其中,对革命历史和阶级斗争的真实反映、对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革命事业的颂扬,自然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当然,有时也难免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政治色彩较为浓厚,文艺题材的广泛性受到忽视甚至限制等。此外,写作方法以颂扬为主,颂扬英雄人物、颂扬革命业绩、颂扬革命精神,“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塑造已露端倪,对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的探寻日趋弱化,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处理方式若隐若现地出现泛化、简单化等倾向。

美术创作也是如火如荼。1961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1931—1949年中国革命木刻展览会”,展出154个作者的500余幅作品。1962年5月,又与文化部共同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1942年至1962年间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创作的2024件作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经典电影和舞台剧,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涵盖了中国现代重要的历史时期,如《林则徐》、《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暴风骤雨》、《燎原》、《怒潮》、《革命自有后来人》、《51号兵站》、《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白求恩大夫》等,塑造了一大批真实感人的银幕形象,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传统教育功能。1961年12月,《大众电影》举办第一届“百花奖”,1962年4月揭晓,《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和舞台剧有:《李双双》、《枯木逢春》、《北大荒人》、《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英雄儿女》、《雷锋》、《年青一代》等。这些优秀影片,“无论在反映和揭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塑造鲜明、生动、丰满的银幕艺术形象,还是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美学追求方面,都比以往有了重要进步。它们以积极向上、爱憎分明、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以及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教育广大观众,对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①创作于1959年的《洪湖赤卫队》和1964年的《江姐》,是中国歌剧创作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两部代表作,深受群众喜爱,它们继承了《白毛女》以来中国革命音乐戏剧的传统,广泛吸收戏曲、话剧和西洋歌剧等表现手法的特长,达到了这一时期音乐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1961年9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部门组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工作,“抢救遗产”。于是,《李慧娘》、《谢瑶环》、《海瑞上疏》、《海瑞罢官》、《四进士》、《四郎探母》等传统剧目或改编、新

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在座谈会上讲到人的改造、人的革命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这个,改革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我强调要过“过五关”。我常讲,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的,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的。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650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下册》,701页。

编剧目，陆续亮相于舞台。1961年10月，文化部和舞蹈家协会联合举行双人舞表演会及座谈会，演出了《春江花月夜》、《弓舞》、《长鼓舞》、《蛇舞》等20余个各种题材的舞蹈节目。1962年1月，北京举行舞剧会演，8个歌舞单位1200多名舞蹈工作者联合演出了59个节目。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70多个单位的舞蹈工作者来京观摩并举行座谈会，盛况空前。1962年12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召开独唱、伴奏音乐座谈会，全国20多个省市的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评论家出席了座谈会。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新中国音乐创作的高峰期。艺术家们以昂扬向上的音符，抒发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克服困难、走向美好明天的决心。如声乐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接过雷锋的枪》、《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支山歌给党听》、《谁不说俺家乡好》、《马儿啊，你慢些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更是广为传唱，具有很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1957至1966年的音乐创作，当代乐评人李皖不无惊喜地感叹道：

生活，生活，生活。美景，美景，美景。民族，民族，民族。从1956年开始的十年，充盈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赞歌，赞歌中处处流淌的，却是这三个元素。

此时，中国大地上劲吹着民族风。几乎没办法分清楚，它是音乐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本来就有的小调。很多时候，原有的一个调子，也许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将它填上新的、歌颂社会主义的词，于是，就成了一首“战地新歌”。过去，这个曲调只在很狭窄的民族地区流行，现在却流行到了全中国，甚至飞出了国界，飞向了全球。^①

^① 李皖：《六十年三地歌之2：民歌嘹亮（1957—1966）》，载《读书》，2010（12）。

新闻发言人

微博时代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探索、 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Role Re-modeling of
China's "Spokesperson System" in the "Era of Micro-blogging"

史安斌^①

中文摘要: 本文以政治传播学中的“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为概念框架, 结合作者对国内相关现状的调研, 运用中外比较的视角, 对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构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对今后如何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品质和影响力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 宣传, 传播, 政府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布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have been implementing the “spokesperson system” and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ir publicity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ce 2004. Based on the “propaganda” model and “publicity” model in the Western-impor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uthor’s field survey of China’s status quo,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media relation and the role re-modeling of the government spokespersons in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lso offer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ity in China.

Key Words: propaganda, publicity, government spokesperson, press release

^① 史安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刚刚过去的2011年之夏充满了“喧嚣和骚动”,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从“郭美美事件”导致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到“卢美美事件”引发的网民对慈善事业的质疑,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的“墓碑门”到北京故宫接连不断的“十重门”,尤其是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职,激起了学术界、媒体和公众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定位的重新反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新闻不断的火热夏天将会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一方面,它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最终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实现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本文从公共理论的建设、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和新闻发言人角色的重构三方面,力图对近8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为今后提升政府新闻工作的质量和有效性提供一些实践和政策性的建议,并对2012年及今后新闻发布工作的改革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和展望。

一、从宣传模式到传播模式:公共传播的理论探索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是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是指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信息传输和意见交流的过程。具体而言,各级政府部门所进行的公共传播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史安斌,2004):

- 人际传播(例如,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专家与公众进行的面对面交流)
- 群体传播(例如,在某个社区或组织内召开小范围的座谈会)
- 社区传播(例如,在学校、商场、居民小区或民间机构内传递信息)
- 组织传播(例如,在某个单位、公司或组织内传递信息)
- 大众传播(例如,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传递信息)

无论在公共传播的哪一个层面上,新闻/信息发布机制和新闻发言人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西方许多国家倾向于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公共传播”和“公共信息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简称PIO)来代替“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等传统称谓。

从本质上说,新闻发布机制体现的是政府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宣传模式向公共传播模式的过渡。从政治传播史上看,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政府部门通常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总动员”式的宣传模式来传递相关的信息。在全球传播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虽然在战争或抗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势下,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常态环境下,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为“人性化”的手段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就宣传和传播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用人际传播理论中的“冰山”模式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模式是从心理学上的认知结构论借鉴而来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把人的认知结构划分为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面。在他看来,人的认知结构仿佛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是意识层面,通过人们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藏在海面以下的则是无意识层面,而半遮半露的则是潜意识层面。后两个层面渗透着人们的信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表现出来,但有时也会以梦境、口误等形式表现出来。

(Rogers, 1997)

在此基础上,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霍尔提出, 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也在三个层面上起作用: 在意识的层面上, 人际传播可以让人们获知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外部行为产生影响; 而更为有效的人际传播往往还能在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知情”的愿望, 而且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信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使其在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判断和评估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Hall, pp. 3-24)

如果把上述的“冰山”模式拓展到公共传播的层面上, 我们便可发现传统的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信息传递的效果上。前者只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 其影响往往只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上, 而后者则除了能够让受众获知信息外, 还可以通过劝慰和说服等手段, 在更深的认知层面上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在获得资讯的信源和信道日趋多样化的今天, 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方式显然也应当得以丰富和发展, 以期适应受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目前, 在我国各级政府推行的新闻发布机制便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如何通过有效的新闻发布机制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进而影响他们的认知、判断和评估, 从而在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一直是在民主制度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课题之一。早在19世纪初,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就做了以下阐述: “一个人民的政府如果不给人民提供信息或获得信息的渠道, 那么它将成为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开端——也许两个都是。”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对于国家政体建设的重要意义。这样的理念被美国历届政府沿袭下来, 即便是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也没有动摇过。正如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 “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 国家才会太平”。(Sullivan, p. 24)

20世纪60年代初, 富于青春活力和人格魅力的肯尼迪总统为美国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在他的政见当中也包括对传统宣传模式的突破, 首次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到处理政府与媒体、公众的关系上: “信息的流动、在知情基础上做出选择的能力以及批评的能力等等所有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假设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Sullivan, p. 25) 如果说传统的宣传模式只是做到了信息的传输, 满足受众的知情要求外, 那么传播模式则在此基础上可以发挥说服的效用, 从而影响受众所做的选择和评估。显而易见, 传播模式的引入适应了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分层化、信源和信道多样化的大趋势。

具体而言, 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宣传模式	传播模式
传递对象	点对面	点对点
传递方式	单向传输	双向互动
传者/受者关系	权力关系	平等交流
信息符码	主控符码	普遍符码
传播效果	意识层面的被动接受	潜意识层面的主动同意

我们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进一步阐释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之间的区别。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发社论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政府声音的主要方式。显然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 传者是一个点——为政府代言的评论员, 而受者则是一个不加细分的层面——例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这种点对面的传播是单向的, 受者并不能进行即时的回馈。它所体现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 所使用的是以官方话语为主导的、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主控符码”。例如, “人民体”和“新华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都属于这种“主控符码”的范畴。在2003年SARS危机初期, 我国的部分主流媒体使用了“打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的说法。类似这样的“主控符码”对于那些不熟悉大陆政治文化语

境的受者来说容易产生歧义。无怪乎有的港台记者和外国记者望文生义,误以为我国政府要用类似于战争动员令的手段来解决 SARS 危机。从传播效果来看,运用宣传模式传递的信息往往只能影响到受者的意识层面,换言之,可以做到“入眼”、“入耳”,但很难做到“入脑”、“入心”。

在媒介高度发达、资讯趋于“饱和”的今天,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方式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此,在传统的宣传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公共传播的模式,不失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权宜之计。作为公共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新闻发布会是一种点对点的信息传递——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进行资讯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这显然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模式,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新闻发言人突破了政府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与作为公众代言人的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这也有助于政府树立亲民形象。与社论等传统的宣传手段相比,新闻发言人使用的是带有普遍性的符码——例如口头语言(称为“言语”,区别于书面语言)、身体语言(包括手势、表情和服饰等等)。与各种宣传手段相比,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传播方式,而新闻发布会又能够为传者/受者提供一个充分的交流和互动的话语平台。因此,从传播效果来看,有效的新闻发布机制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它能够突破受者的意识层面,在其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影响力,达到“制造同意”而非“强制接受”的效应。

诚然,从宣传到传播的模式转换只是对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化的一种尝试。这种模式转换充分说明了新闻发布机制和新闻发言人是—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这项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符合—当下社会政治的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犯“准橘为枳”的错误。对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化探索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语境下具备—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构问题。

二、从“官职本位”到“专业本位”:新闻发布的制度创新和发言人角色重构

尽管早在 1983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重点是涉外部门)就已经启动了新闻发布机制,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这项制度在全国得以全面推广还是从 2003 年开始的——尤其是在 SARS 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到 2004 年底,国务院各部委和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在公众较为关注的卫生、公安、教育、环保、应急等重要职能部门,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市县一级的定期新闻发布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新闻办采取了“以培训带建设”的方式来推进新闻发布制度。2003 年底,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外资深记者的支持下,国新办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组成了由主管领导、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组成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国家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也被媒体和公众亲切地称之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随后,这支“国家队”到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培训工作,学员参加完培训后便以发言人身份亮相,带动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短时间内在我国的全面推行。

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中国政府推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仅 2010 年,中央和省市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达到 1700 余场,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罕见的,彻底改变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密室决策”、“暗箱操作”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满足了新媒体时代我国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诉求。与之相应,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成为被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要角色。“黄埔一期”中的一些优秀学

员,如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直到今天仍活跃在新闻发布工作的第一线。北京的王惠、上海的焦杨、南京的徐宁等女性发言人被人们称之为发言人中的“三朵金花”,他们在重大事件新闻发布中的出色表现和“经典语录”,至今仍被许多中外记者和网民津津乐道。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中,2009年席卷全球的甲流风波和2010年的新疆7·5事件等危机事件中,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2011年的建党90周年等大型庆典和全球性体育赛事中,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秉承“真实、透明、迅速”的原则,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从2010年下半年起,从中央到省市级的党委职能部门又开始全面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新闻发布机制业已成为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重要保障之一。从本质上说,新闻发布机制体现的是政府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宣传模式向公共传播模式的过渡。从政治传播史上看,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政府部门通常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总动员”式的宣传模式来传递相关的信息。在全球传播时代,尤其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虽然在战争或抗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势下,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在短期内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全球、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更为“人性化”的手段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这也符合胡锦涛主席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提出的要求:“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习近平副主席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也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21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业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

毋庸讳言,新闻发布制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和铁道部发言人的离职使得这个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积弊被放大,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由于我国的政府部门采用的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官员兼任”的新闻发言人任用机制,再加上新闻发布的权责界定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中,因此,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常见的专业新闻发言人付之阙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良性运作。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和“黄埔一期”学员、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长达八年之久的王勇平的表现及其职务变动所引发的关注,便是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中的积弊和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跟不上新闻传播生态变化的典型例证。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新闻发言人是负责为各种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发布新闻和传递信息的“使者”,属于传播学所说的“信道”这一环节。在我国现存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之下,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新闻发言人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在美国,他们所属的行业组织称之为“全国政府传播工作者协会”(NAGC)。这里所说的“政府传播者”除了新闻发言人,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新闻官员、公共信息官员和从事媒体公关的专业人士等。该协会在美国的注册会员超过万人,成为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中坚力量。

新闻发言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首先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岗位。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都有政府和媒体长期工作的经验,需要接受新闻学、传播学(包括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亚学科)、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从1950年代(即艾森豪威尔执政

时期)开始, 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他们使用的是“新闻秘书”的称谓)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是在媒体工作过, 而在近30年来, 这个比例几乎是100%。最近10年来, 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是由资深的电视主播或记者来担任。有“网络总统”之称的奥巴马已经从网络媒体选拔了一批青年人进入白宫的新闻发布工作团队。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也将有来自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出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专业化不可能一步到位。2003年至今, 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不懈努力下, 基本上完成了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的配置。据笔者掌握的情况,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 一是主管领导, 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 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 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和推进新闻发布制度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看, 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缺陷到了“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微博时代就暴露的更为显著。

上述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 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 不能熟练运用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专业传播语态和策略来进行沟通, 这与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要求是一定距离的。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发言人面对记者的诘问要么三缄其口, 要么用空话、套话敷衍塞责, 要么发出“雷人言论”引发更大危机。新闻发言人不敢或不愿发布新闻, 新闻发言人本身成了新闻, 这都是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此外, 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被简单地划归到宣传部门或行政部门(如办公厅), 新闻发言人大都处于“有职无权”的状况中。实际上, 新闻发布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工作,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工作。新闻发言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保障, 就无法对所在部门的新闻发布做出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 也无法进行各部门之间协调“口径”的工作。即便是由“二把手”出任发言人, 按照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 他也无权了解分管领域之外的情况, 更不要说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了。

除了媒体经验之外, 新闻发言人还应当承担传播团队领导者的角色。新闻发言人身后应当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和传播团队的保障, 这样才能确保其开展有效的工作。美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衔, 但他可以得到所在部门主管领导的特别授权。列席该部门决策层的会议, 对高层决策有着通盘的了解, 与决策层和各部门一起商议新闻发布的口径。与此同时, 他所领导的传播团队承担着搜集舆情、撰稿策划乃至新闻发布会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没有这些幕后工作, 身处台前和聚光灯下的发言人是不可能有出色的表现的。

7·23事故的新闻发布所引发的全民大讨论, 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促使各级领导重新认识新闻发布工作和新闻发言人的定位和属性。为此, 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

1、突破现有的“归口管理”模式, 按照国际惯例设立新闻发布的独立职能部门, 即“新闻处”或“新闻发言人办公室”, 全面掌握和协调本单位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信息。

2、突破传统的“官职本位”模式, 明确规定新闻发言人的职权范围和责任。例如允许他们列席高层决策会议等, 授权他们邀请相关的主管领导在必要时共同面对媒体等等。

3、按照国际惯例招聘新闻发言人, 尤其是吸纳有长期媒体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新闻发布团队。

4、适应微博时代的“新闻传播分秒必争”原则, 在现有的新闻发布会基础上, 采取定制新闻(RSS)、微博发布等多种形式, 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要求

总的来看, 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要突破目前单一的信息传输职能, 变被动应对媒体和公众为主动影响和引导舆论, 建立并且维护政府部门良好的媒体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立新闻发布机制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还应当通过这一机制加强公共传播效果, 从而

影响公众的选择、判断和评估,为政府部门履行职能和开展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国内舆论环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专业化,即从“官职本位”逐渐过渡到“专业本位”,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在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愈发凸现出来。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必将有利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尽早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在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建立一个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的公共话语场。

三、内外互动和大事件驱动:新闻发布工作改革的前景展望

无论是从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压力来看,2011年都无疑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各种网络新闻搜索引擎上,“党委新闻发言人”和“7·23动车事故”成为与新闻发布高度相关的“热词”,相关的新闻或帖子达到数十万条。这两个“热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这一年所获得的“内在动力”和所面临的“外在压力”。

新年伊始,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学员并作出重要指示,这标志着继2004年全面建立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制度以来,这一制度又开始向更高层面推进。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以此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频频高调亮相,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相得益彰,从而使已经实行七年有多的新闻发布制度与“党政一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这对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推广和深化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内在动力。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闻发布制度所面临的外在压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1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用户突破了2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围观”习俗,加之中国特色的微博所设置的“评论”功能的放大效应(在美国, Twitter等类似的社交媒体则没有这个功能),新兴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有扩音器”,成为了各级党政领导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无疑是微博时代新闻发布制度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微博所形成的排山倒海的舆论声浪中,姗姗来迟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遭受了自SARS以来媒体公众对政府部门最为激烈的批评和质疑,甚至惊动了中央最高层领导扶病亲自出面平息。在发布会上仓促上场的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他“高铁体”式的回答成为媒体和公众宣泄不满的对象,最终不得不结束了七年的任期而黯然离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使用了“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这样罕见的“煽情”标题,对自SARS之后全面建立的政府发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引发了其他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的纷纷跟进,使得“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继2004年首批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亮相后,再度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再度赢得了领导层和决策层的认可。新闻发布工作的有效性也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检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领导层的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在相关文件中根据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精神,再次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为了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1年必将成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没有过去七年来新闻发布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可能赢得决策层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也不会引发媒体和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制度变革和实践创新大都遵循了“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轨迹。一方面,外在的压力使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另一方面,内在的体制和机制中已经孕育出了变革的“种子”。危机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变

革水到渠成,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到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皆是这种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产物。新闻发布制度改革与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各种改革一样,也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后几年中,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1、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为新闻发布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过去七年来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看,新闻发布工作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和决策层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换言之,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传播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执政水平和决策效果。习近平副主席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新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新闻发布工作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关注、支持和参与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一项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的“孤军奋战”。

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党委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可能由掌握全面情况的“一把手”来担任,而通常是由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官阶较低的领导干部担任,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还不可能出现国外那种“全知全能”型的专业新闻发言人。后者往往会获得特别的授权列席最高层级的会议,掌握全面信息;同时,他们往往是从新闻界直接招聘而来,因此也就熟悉如何将政府特有的“公文语言”转化为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语言”。

在我国现有的“官职”型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下,一方面,各级党政部门要借鉴国外经验,为官阶较低的新闻发言人“赋权”,为他们创造全面把握信息的机会,同时也要让他们通过参加培训和到媒体实习等方式,熟悉和掌握“新闻语言”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另一方面,各级党政部门也要让“一把手”关注、支持、参与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新闻发言人的坚强后盾。在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热点事件发生时,各级“一把手”应该主动面对媒体,为公众解疑释惑,化解内外矛盾。关于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广东的汪洋书记等高级领导人,已经为各级党政“一把手”作出了表率。

2、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拓宽信息传输的渠道,从内容和形式上坚持“受众第一”的原则,为提升新闻发布的有效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未来,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还会更加凸显,传播中的“内容层面”和“关系层面”之间的结合也将会进一步加强。换言之,新闻发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还取决于“谁用什么方式来说”。

2011年先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不列颠之夏”、“美国之秋”等一系列骚乱事件,这些群体性抗议大多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愤怒的青年人”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动和组织。这也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微博执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基本沿用了借助传统媒体发布的方式,其时效性和针对性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受到了一定局限。2011年3月,日本东部发生地震海啸。我国的少数利益群体通过微博发布虚假信息,引发部分地区发生“抢盐风波”。应该说,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还算及时,但由于未能有效利用微博发布,在信息更新速度以秒来计算的时代,谣言仍然跑在了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影响了社会稳定,甚至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011年微博发布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利用。这一趋势在今后还将继续下去。除了通过开通微博形成与公众进行常态互动的机制外,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还应探索如何对“政府微博”和“官员微博”进行整合,进而与传统新闻发布相辅相成,打造政府新闻发布的全媒体发布平台,强化政府新闻发布的“媒体聚合效应”,加强政府新闻发

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2011年11月17日正式上线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尝试。正如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所言，这个微博发布平台将分期分批将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纳入信息发布平台，“不作僵尸不作秀”，将即时发布和定期发布相结合，满足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需求。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省市的政府部门借鉴北京经验，在微博发布方面做出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方面工作都是长效性的，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同时也都缺乏国外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需要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2012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是举世瞩目的“媒体事件”。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将进行换届。在这种“大事件驱动”的效应之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党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和有关党委系统的换届会成为海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议题。如何做到充分利用党委新闻发言人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如何进一步开掘中央党务部门的新闻发布空间？如何协调地方党委和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以上这些都是当下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尤其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总之，只要沿着“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在广度、深度、信度、效度等诸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也将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中国模式”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参考文献：

Chess C., Hance BJ.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ll, Edward T..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Double Day, 1976.

Rodman, George. *Mass Media Issues: Analysis and Debate*. 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 Inc., 1981.

Rogers, Everett M. & Thomas M. Steinfat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1999.

Sullivan, Marguerite H. *A Responsible Office: An Insider's Guid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

Yale, David, R. *The Publicity Handbook*. Chicago: NTC Business Books, 1991.

[美]罗伯特·希斯著：《危机管理》，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史安斌著：《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薛澜、张强、钟开斌著：《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新闻发言人

西方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与 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

The News Release Experience of the Main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ews Spokesperson System Construction

孟建、林溪声^①

中文摘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任务, 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从政务公开走向党务公开的历史进程。本文通过对美、英、德等国家主要政党在新闻发布方面历史经验的梳理, 分析了其新闻发布理念与运作方式。以此为背景,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借鉴西方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 以及如何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西方政党, 新闻发布, 经验, 中国共产党, 制度建设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o build the party press spokesperson system. This signifies our country is moving from public affairs opening to party affairs opening. Through tracing the ma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s releas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new public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examined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press release, undertook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provid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political news publicity and promote the party press release system.

Key Words: Western partisan, press releas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construction

^① 孟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林溪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博士后。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华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党建设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我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对于建立我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和突出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相对于建设和推进多年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较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而言,党委新闻发言人主要面向党员内部,保障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党委新闻发言人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党内所倡导的精神,制定的政策、制度、措施以及党员干部组织建设情况等;从效果上看,党委新闻发言人是在新媒介环境下推动党务信息公开以及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属性和领导核心地位,使党委新闻发布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府新闻发布更受瞩目。^①作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建党几十年来的新闻发布工作,梳理国外政党的工作方法,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实践中努力探索中外政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历程与经验。

一、西方主要政党新闻发布活动的历史与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11月4日当选为美国第七任总统,1832年11月6日又蝉联总统,是美国最早聘任新闻发言人的总统。其后几任美国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以总统私人助理的身份出现,直到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上台,其新闻发言人开始从向政府领取薪水变身为官方发言人。塔夫脱当选总统期间,每周定期安排两次记者招待会,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固定下来,并逐渐成为美国政府运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政党组织一般只在选举前后与公众进行有限的接触,对它们来讲,最终奋斗目标就是上台执政,所以政党的一切纲领和政策主张都是为争夺选民、进而实现执政目的服务的。从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背景来看,获得选举权的普通民众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大众化媒体的兴起也刺激了民众对信息的强烈需求,经济的飞速发展更使得公众愈发在意自身的利益得失。而新闻发言人制度正是在迎合政治人物阐发政治理念、解决形象危机、进一步控制舆论的需要下产生的。举凡美国总统均对记者招待会非常在意,他们经常亲自回答记者提问,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联邦机构都有例行吹风会,其他政府部门虽然在时间安排上没有如此密集,但一般也都有固定时间召开此类会议。全美各级政府约有四万名新闻发言人,包括美国知名媒体在内的世界顶级媒体也都在重要政府部门派有常驻记者。

为了赢得选举,在政策主张上,美国两个主要政党都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都能很快根据现实情况和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变化,制定出迎合选民心理的政策。背景说明会是其中广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新闻发布形式,它不需要与事件相关的官员或政治人物亲自出马,只是安排与事件不直接相关的人去说明情况。由于背景说明会并不那么正式,发言人与事件又不直接相关,从表面上看显得更加真实、更有说服力,因而常被用于打击政治对手、测试公众对事态的反应。

受美国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以及政党文化的制约,美国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温和、中庸,在组织结构方面分离、松散,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逐渐淡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在意拉拢选民。各类候选人纷纷聘请新闻发言人或新闻代理人来替自己处理沟通媒体、接受采访、安排广告等一系列工作,并越来越重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如两党候选人及其竞选机构都开设有自己的网站,以介绍候选人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立场主张,同选民进行交流,回答选民关心的问题;接受电视、电台或报纸采访,出资购买播出时段宣传候选人政治理念;深入各选区走访,广泛接触选民,召开各种类型的集会,参加辩

^① 胡怀庭、赵新乐:《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思考》,载《新闻与写作》,2009(12),35-36页。

论会、造势会等^①。

由于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国民文化素养较高,造就了英国大众媒介和信息产业的发达。大众媒介形式多样,又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以至于英国政府和执政党往往会就重大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向大众媒介咨询。每当重要的法律和政策出台,或者政府采取某项重大措施,英国各种媒体都会评头论足,各自发表观点和意见,而且批评要远远多于赞扬和支持。^②此外,在披露政治丑闻、揭露政治腐败、声讨违法犯罪行为上,英国的大众媒介也是不遗余力,执政党面对媒体社会调查的压力必须做出恰当回应,否则就会受到严苛的责难。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英国非常普及,主要用于协调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政党信息公开和宣传方面,英国的政党网站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③据了解,1997年大选时,虽然大部分政党并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但拥有网站的政党还是坚持更新网站上的信息,使政党网站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2001年大选时,选民可以从各政党网站上免费下载到政党宣言和政策的文本信息。其中,保守党的政党宣言还提供了外文版,工党则针对青年人和商界提供了附加性的政策资料。大约有25000人从苏格兰民族党的网站上下载了政党宣言。工党和自民党还鼓励网站用户向朋友和同事发送电子明信片,里面包含相关政党的政策信息和访问网站的邀请。工党网站提供了信息查询功能,用户输入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就可以找到该地区工党候选人的联系方式和他的工作业绩,同时还提供了该地区保守党候选人的负面信息。在自民党的网站上,备有政党领导人的在线广播。此外,大选来临时,各政党候选人也纷纷利用电子邮件、个人博客、个人网站发布个性化的信息与选民进行沟通,使选民更多地了解自己。英国的主要政党还通过互联网的窄播(narrow casting)能力,把定制后的网页和信息发送给特定的组织和个人,期望对选民的最后决定产生影响。在2005年的英国大选中,据调查共有18%的人认为,互联网帮助他们做出了更明智的选择,19%的人称互联网帮助他们下定了决心。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存的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在党的宣传机制上,社民党高度重视媒体工作,把拥有适应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该党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着力从原来新闻报道的对象成为报道主体,引导舆论为本党服务。在宣传手段上,社民党主张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扩大宣传阵地。如利用因特网技术扩大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面;推行红色电脑、红色手机计划来革新党内信息沟通手段。社民党内甚至还提出了建立一个“网络党”的主张。

对社民党的所作所为,该党资深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曾评论说:“今天在政治生活中有四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经常在媒体露面的政党的高层领导人;二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媒体讨论;三是民意测验;四是政党。但政党实际作用不大,如果施罗德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党也会跟着改。”^④这一观察,不仅适用于德国政党,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政党。他们与媒体之间既合作又存在博弈,这种关系不仅是政党专业选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日常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与信息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现代媒体为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政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媒体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选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赖党的基层组织、群众党员来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政党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塑造良好的政党领袖形象来扩大本党在选民中的影响力,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广泛采纳了媒介逻辑,媒体政治日益导致对政党领袖的推销和包装。

^① 参见何军:《美国政党与媒体的关系》,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2),68页。

^② 张宏艳:《英国政党执政方式研究》,载《理论探讨》,2008(4),129页。

^③ 有关英国政党网站情况的介绍详见马千山:《英国政党对互联网的应用》,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4),96页。

^④ 托马斯·迈尔、罗云力:《托马斯·迈尔教授访谈纪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126页。

要在媒体政治中获取成功,西方政党组织在决策模式上流行的做法是:先由某些独立的顾问委员会或民间研究所提出意见或建议,然后交付媒体由公众讨论,若反映良好就采纳这一政策,反之则放弃或大幅度修改这一政策。当政党领导人决定采纳某一政策时,作为政党领袖就要努力使全党认识到,如果想使该党继续执政或赢得大选,就必须支持这个政策,这一做法被形象地比喻为发放“试探性气球”。同时,政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还要恰当地遵循媒体运作的两种主要的策略体系:一是筛选策略,应选择那些值得媒体报道的事件或有机会成为现实图景的事务成分进行发放;二是展示策略,依据媒介性质来决定以什么形式在传媒中展示某些报道或信息,使之有望在受众中引起尽可能大的兴趣。政党必须适应这两个策略,但又不能完全屈从于这些“仪式”。

虽然我们在这儿主要就美、英、德三国政党的新闻发布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这三国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总体而言,西方的主要政党一般都不公开、直接地控制媒体,非强制性传播控制是西方政党传播控制的主要形态。非强制性控制的手段主要包括变相资助非政府的传播机构,对倾向己方的传播者给予优惠或特权,压制不同政见的传播机构,以及新闻操纵等。例如,新闻发言人作为调解人,可调停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环境下进行工作的要求与新闻记者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同时,新闻发言人也可从政府自身立场出发,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的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府的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管理。^①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历史溯源

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许多新闻策略给予了肯定,尤其是对公社权力机关每天公开会议记录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社的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公社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②当年巴黎公社每天公开会议记录(除军事秘密外)的初衷,与今日新闻发布的宗旨——“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似乎不谋而和,可以视作是第一个开新闻发布先河的无产阶级政权。

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建党之初。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条为“工人组织”,第二条即为宣传。具体内容为:“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③。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初步确立了党管媒体的制度模式。自此,党对内沟通和宣传,普遍采用了系统内部自建的机关报体系作为边区政府新闻发布的平台。

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历史上,新闻发布活动虽不多见,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以独特的形式存在过。有研究者曾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类^④:

1、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① 曹越:《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与现状》,载《新闻记者》,2003(7),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14~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④ 罗忠敏、刘汉峰:《党史上的新闻发布:毛泽东曾是“中共发言人”》,载《北京日报》,2010-09-01。

2、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如抗战期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消息。国共和谈时期,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周恩来、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新闻发言人

3、特别署名发言人的新闻发布:比如,1945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9年1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消息,以上都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的新闻发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领导核心,也以公共权力核心的形态直接指挥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行,再加上媒体公私合营混杂的特殊情况,党的新闻发布与中央政府的新闻发布合二为一,催生了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发布制度,具体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发布相关管理办法中。1949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新闻发布条例。这部条例对重要新闻的发布主体、发布内容、发布渠道等均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新闻秘书”一职的设立,并对新闻记者对公布内容进行采访的权利做了原则说明。

除了中央人民政府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参照暂行办法陆续制定颁布了新闻发布条例,如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统一发布本会及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暂行办法》、湖南省颁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发布省政府新闻暂行办法》,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工作方案》等。有学者认为,从暂行办法的设计可以看出,新中国的新闻发布已经初具现代新闻发布制度雏形,并初步具备了现代政治传播的特点。但也必须承认,早期新闻发布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暂时性,从中央到地方首先是为了保障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服务于建国初期塑造意识形态认同的直接需要^①。

随着媒体公私合营的完成、政治生态的单一化,早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还未成气候,就开始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回顾五六十年代正式的新闻发布工作,多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如1961年日内瓦会议、1962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等,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历史性的政治任务。在对内传播方面,并没有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政府对内传播的信息仍然通过指令性方式,由党报党刊和新华社向公众传播。

三、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发布活动

我国新闻发布工作正式启动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0年,中国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处理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一次新闻发布会。1982年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勃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担任发言人。1983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

^① 周庆安、卢朵宝:《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发布活动的历史考察》,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卷,2009(12),81~83页。

善新闻发布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逐渐走到前台,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出规范:国务院会议做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以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同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做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民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做权威性解答,由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者录音、录像剪辑。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务公开的可行性举措,开了党务公开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以来,党务公开最透明的领域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均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中心,并不断探索和实践新闻发布的多种形式,积累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丰富经验,执政党的党务公开步伐逐渐加快。在中共中央部门中,与国台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中台办率先于2000年9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形成例会制度。被喻为“党的外交部”的中联部,也较早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并首设“公众开放日”。2003年9月25日,中联部成为第一个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时任副部长蔡武向媒体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情况。

2005年和2006年两年,党的多个中央部门和机构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之后,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指出要健全和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中央外宣办、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多层次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动新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①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借国务院新闻办平台,介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情况,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还回应了其他敏感问题。到了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布了7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党务公开成为舆论焦点。此举被视作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时提出,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党内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决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目前,党中央部门中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台办、中央档案馆等10余个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0年6月30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外宣办(即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共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会上逐一介绍了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中共中央部门和单位的11位新闻发言人。在此次会上,这11位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同中外记者见了面,并向中外大批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新华网直播了此次见面会。中央外宣办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见面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以中央外宣办的名义组织发布会是我们推进党务公开工作的一个做法,今后有关党务信息的发布,将会以中央外宣办的名义组织。此后,全国各地在实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出现了较好态势。例如江苏南京、广东深圳、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贵州贵阳等多个城市就先行先试,积

^① 华清:《加快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11),16页。

累了一些初步经验。目前，随着中共中央相关重要文件的下发，此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2011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央领导亲临培训班会见学员并发表重要讲话。此举标志着我党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落实和快速推进的阶段。

四、借鉴外国政党新闻发布经验，大力推进我党新闻发布工作

毋庸置疑，经国新办近年来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得以逐步推开。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已将此项工作写入决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工作。2010年以来，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出现了一个可喜的新局面：以建党89周年和建党9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为标志的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全面起步和渐次推进。但是，与外国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毕竟起步不久，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总体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真正实现我国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的历史性转变。由于我国特有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性如何，直接关乎国家形象。而党委新闻发布制度，又是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首先就要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建设，要把党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用生动有效的新闻发布形式予以及时、公开、准确的“告知”，并在这过程中避免“流于发布形式，为发布而发布”的问题。以真正实现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看得清”、“看得透”的“透明屋”。同时，还要让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委新闻发布工作给予很大的关注与期望，使之成为维系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红纽带”。

其次，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形成党政新闻发布的合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化建设的推进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党委新闻发言人信息发布权限问题。政府出台了“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法规，使得政府新闻发布逐步“有法可依”。党委新闻发布问题，是否也要考虑此举？中央是否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文件予以规范？二是统筹协调机制如何设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首要的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中央提出党委要做好“新闻发布协调指导”，那么，党政新闻发布工作“谁牵头？谁主抓？谁负责？”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机构，特别是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协调指导，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三是要切实解决好“重复发布、多头发布、交叉发布、信息不一、口径不一”等诸多问题，真正找准党委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的“区分点”，明晰二者的“区隔度”，形成舆论引导的合力。

第三，建设一支高素质党委新闻发言人队伍，运用多样、灵活、有效的新闻发布形式予以发布。做好党委新闻发布工作，还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要使党委新闻发言人的素养具备“个性”，特别是要尽快使他们成为党务问题的专家，在这基础上做好新闻发布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等诸多重要问题，党委新闻发言人都要有深刻认识和了解。二是要充分运用生动、灵活、多样的发布形式做好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正因为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有着外界（特别是境外和国外）不理解、“妖魔化”严重、阐释难度大等特点，才要求党委新闻发布要比政府新闻发布更具备专业化，甚至是“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发布更要有新闻性、故事性，更要有说服传播的能力与技巧。三是要多多借鉴国外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借鉴我国政府新闻发布积累起来的经验，防止党委新闻发布工作一味追求“另辟蹊径”。正因为这些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党委新闻发布可以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起跳”并少走弯路。

全球传播研究

中国电视“走出去”与新华新闻电视网的创新之路

Chinese Television Going Global and the New Way of CNC

郭镇之^①

中文摘要: 新华电视在中国电视“走出去”的事业中异军突起,其发展变化引人注目。本文以新华电视为核心,解读中国传媒新一轮的电视“走出去”工程,并对中国新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思路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在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利益时代,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资源的目标在中国电视“走出去”的媒体动机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带来体制内部的竞争和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本文希望,在内部竞争和外部接触环境下积累的经验 and 增加的实力,能够推进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步伐。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提出新华电视的创办与中国电视新闻体制创新的主题;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电视“走出去”的背景,提出内部竞争的问题;第三部分尝试分析新华电视矛盾的身份与国内外竞争的困局;第四部分是结语,简单讨论新华电视可能采取的竞争策略。本文认为,中国需要解决的是内部竞争的有序性和真正从实际需要出发、扬长避短的竞争策略。

关键词: CNC, 中国电视“走出去”, 中国新闻体制改革

Abstract: Xinhua News Agency impressed the world by its launch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ervice (CNC) in 2010. Starting from the birth of CNC, this paper tries to decipher this new round of “going glob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orm in the Chinese journalism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 motive of seeking for political capitals and economic resour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the goals of the “going global” projects by the Chinese news media, bringing in possibilities of domestic impact and future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hopes to witness the reforming process of the Chinese TV journalism, with increased experience and enhanced force from internal competition and external encounters.

This paper includes four parts. Introduction, the first part, raises the them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system inspired by the new-born CNC; the second part is on the background of going global projects of the Chinese television, focused on the domestic, instead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ird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awkward situation of the CNC in the global market, owing to the Xinhua’s status as one of the key mouthpieces of the state and the Party.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possible reforming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This paper hopes that to go global China needs orderly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across the world.

Key Words: CNC,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television, Chinese journalism system

^① 郭镇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一、导言：新华新闻电视网与中国电视新闻体制创新

自2010年7月1日“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全球英语频道正式上星播出,至今已超过一年;距CNC中文普通话频道2010年1月1日试播,已将近两年。对CNC作初步的观察和评论,似乎已有可能。

检索网上,关于CNC的消息仍然只围绕开播的信息,缺乏进一步的评论。这说明,在热闹的首创行动之后,新鲜的关注已经归于沉寂。

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当然可以是多样的。本人认为,这表明:CNC进入了创业的艰难期,必须承受国家传媒机构及其宣传使命与商业传播模式及其受众市场压力之间的内在矛盾。从一开始,CNC便遭遇了国际受众和国内广播电视同行的双重疑虑;CNC还面临着国内传播的政策排挤,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这个可行的培育机制来增强国外竞争实力、积累电视传播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可以断定,CNC的未来之路是不那么乐观的。

但是,CNC的创新对于中国新闻体制的改革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传媒机构画地为牢、各占一方,互不染指或者卷入不深。这种“守土有责”的观念,在全媒体时代已经过时。先是印刷媒体的藩篱被渐次突破,现在陷入重围的是广播电视媒介。再下一步,则可能是所有形式的新闻传媒乃至大众媒介新一轮的融合、重组与定位。受众选择的多元化应是中国传播之福。

而在广播电视领域,CNC如能打破中央电视台(CCTV)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仅对大众媒介的传播服务,而且对CCTV的新闻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对新华电视(CNC)的案例做一点初步的思考,采用的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和战略策略分析。作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深度访谈获得对自己粗浅印象的核实或者矫正。

本文分为几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导言提出问题之外,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传媒走出去的时代背景和主流媒体之间的电视竞争,第三部分分析新华电视内外竞争的矛盾和困局,第四部分结语,是对新华电视竞争策略的简单分析。总体而言,本文认为,CNC的加入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传媒的体制改革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而这种改革的效果要在体制机制转变的前提下才会真正发生。本文还认为,中国需要解决的是内部竞争的合法性、有序性和传媒机构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的竞争策略。

二、中国电视走出去的背景：内部竞争

(一) 传媒“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近年来,党中央重提“大外宣”的课题,要求中国媒体“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①,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中国新闻传媒对外传播的这些举措被形象化地统称为“走出去”^②工程。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流媒体增设驻外记者,建立外宣机构,加强中外合作,“走出去”的新一轮举措力度之大,是空前的。

2009年4月20日,隶属于《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成为继《中国日报》后第二份面向全国发行的综合性英文报纸。7月1日,新华网英语电视新闻线路开始试运行,这是新华社继英文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通过卫星、互联网向全球播发电视新闻的一次尝试。7月20日,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开播,9月10日俄语频道开播,由此形成了

^① 王建峰、吕莎:《媒体“走出去”:提升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20, http://www.qstheory.cn/wh/whtzgyfz/200911/t20091120_15663.htm。

^② 对“走出去”有不同的英文翻译,包括“going international”和“going global”。因为使用很多变得著名,有时国外也直译为“going out”。

由中、英、法、西、阿、俄6种语言和8个国际频道组成的对外传播新格局。9月23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新增6种语言网站,语种达到59种。9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英文版创刊,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特别是2009年12月28日,被称为网络视频“国家队”的中央电视台网络电视台(CNTV)举行开播仪式。三天后的12月31日,新华社宣告开办电视新闻网(CNC),首个中文/普通话频道于2010年1月1日播出。

(二) 主流媒体的电视“走出去”工程

在全媒体时代,新一轮的“走出去”工程似乎以电视为核心。这是因为,集声画图文尤其是活动图像于一体的电视是全媒体的核心。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电视播出形式感强,意识形态色彩淡,似乎可以避开宣传说教的指责,在不根本改变意识形态管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话语的改换、符号的更新,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对此,中国电视界早已深有体会。20世纪90年代起飞的中央电视台(CCTV),其新闻改革就是从改变语态开始的^①。当时,通过模仿《60分钟》等西方电视新闻模式(也顺带引进了西方标准的新闻专业主义操作方法,包括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理念),《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得到了“官民学”的一致认可,通过实践检验获得了成功。经过20年的摸索和实践,至少从形式上看,中国电视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1、主流媒体的电视竞争

2010年,中国电视传媒“走出去”有了新的举措。1月1日,广西电视台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频道宣布成立并正式开播。然而。由于广西电视台在中国传媒界并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而且这个频道采用中文向海外播出,在国内外并未引起很大关注。但在2010年元旦同日上星播出的“新华社电视台”,则由于身份特殊、举措意外而引起了广泛瞩目。

“新华社电视台”的正式名称是:“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文全名China Xinhua News Network Corporation(CNC,以下简称CNC或者“新华电视”),所有者名义上是新华社下属的一个商营公司。CNC第一个频道(中文普通话)覆盖范围限于亚太和部分欧洲地区。此后,面向全球、24小时播出的全英文新华新闻电视网于5月1日试播,7月1日正式开播。

新华社不是唯一一家挺进电视的中央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也推出了网络版的“人民电视”。2010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②，“人民电视”正式亮相。其实,早在3月26日,人民网主办的网络电视台“人民电视”就已开始试播。新华电视的推出,似乎使人民电视觉得:不必过分低调。这篇报道点明了“媒介内部竞争”的主题。时任人民网总裁何加正介绍说:从三大中央媒体^③办的网络电视来看,人民电视的资源是最少的,竞争优势相对不如他们。……我们底子很薄,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就可能被别人甩得更远。”^④

确实,在电视“走出去”工程方面,《人民日报》暂时无法与新华社竞争。作为印刷媒体,《人民日报》的受众对象和记者网络主要在国内;而新华社不仅在国内各省区都有分社,其时在海外也已有110多个分社,触角遍布全球。此外,“人民电视”只能在网上和手机等新媒体上收看;而进入网络服务的视频门槛并不高——按照广电总局网站公布的名单,截至2011年6月30日,获得批准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有586个之多^⑤,除了国内“主流媒体”之外,还包括许多商业媒体。而新华电视不仅瞄准了互联网和手机,是“全

^①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② 李志伟:《人民电视:一家报纸的“触电”尝试》,载《人民日报》,2010-05-18(1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5/18/nw.D110000renmrb_20100518_1-15; 人民网:《“人民电视”崛起 中共中央机关报“触电”刷新媒体竞争格局》,
<http://news.163.com/10/0518/11/66VBV6CO000146BC.html>。

^③ 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④ 李志伟,《人民电视:一家报纸的“触电”尝试》。

^⑤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名单,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11/07/21/20110721171831580434.html>。

媒体”。而且,它是正式上星播出的“电视网”,是“真正的”电视。

更重要的是,据说,新华电视的创办获得了中央领导的批示^①,这是中国媒体合法性的最重要根据。新华社屡次选择7月1日作为新创视频服务方式的开办日期,是有中国特色的——它标明了“党和国家媒体”的权威身份。

2、打破媒介传统格局之举

但新华电视的兴办,与中国传统的传媒格局和目前中国的媒介政策并不相符。令人深思的是,中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并未出席2009年12月31日新华电视的开播仪式。而仅仅三天之前,12月28日,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了中央电视台旗下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的开播仪式。对新华电视的出现,国内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正式和公开的报道,更不用说大张旗鼓的宣传了。这种反常的现象说明,CNC的创办带有一定的试验和突破性质,乃投石问路之举。

根据中国媒介政策的规定,管控和经营电视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其所属广播电视机构(分中央、省、地级市和县级市四级)的专属职责。除了成立于1986年的教育电视台是个例外^②,所有广播电视机构都必须接受总局的垂直管理。

面对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网上视频内容,广电总局是经过一番权力博弈,才成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的。在和管理商业性网络公司的信产部竞争的时候,广电总局强调了视频内容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控制的特别重要性。由于这是党和政府最为关切的核心问题,所以广电总局最终获得了对网络视频内容的独家监管权;而信息产业部则仅负责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③,亦即技术支持部分。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名单”,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网上视频播出内容都在广电总局管理之下。也就是说,虽然广电总局实际上不可能决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它们与广电总局同为部级,且政治地位更高)与广播电视相关业务的发展,但从理论上说,它是可以控制其“生死”(许可)的。为了保护属下CCTV等电视媒体的权益,广电总局显然无法乐见竞争者的出现,特别是像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和新闻业务管控方面都比广播电视系统具有更大的优势,其行政地位则在广电媒介之上。

然而,在全媒体环境中,开发视频(亦即电视),是无论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都不可遏止的“发展”冲动。由于传统报业市场日渐萎缩,印刷媒体的发展重点逐步转向网络版。而视频也成为网络媒体新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迄今大部分民营商业网站的视频内容还是以“视频网站”、“视频频道”命名,而中央媒体则利用独特的政治资源,亮出“电视”旗号,并开始了跨界的电视工程。例如,“人民电视”的前身是《人民日报》网络媒体“人民网”上推出的“人民宽频”。经过数年实践,2010年的时候,人民电视已办有新闻频道、访谈频道、纪录片频道、影视频道、娱乐频道、生活频道、播客频道等六七十个频道和《小白闪报》、《小六砖头铺》等七八个原创栏目,其中娱乐性较强的《小六砖头铺》已经被好几个城市的移动电视媒体订制了内容。

自诩正规部队的电视界一向不把网络“杂牌军”放在眼里;只有新华电视的闯入,才真正动摇了电视界(更准确说是CCTV)的信心:以新华社的国际报道经验和全球传播网络,

^① 东方早报:《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今天上星播出》,2010-01-01,转载自凤凰网:
http://media.ifeng.com/news/tradition/tv/201001/0101_4271_1495108.shtml。

^② 教育频道是在1986年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特例。尽管广电总局后来一直企图将教育电视纳入掌控,但没有完全成功——只规定了对内容的监督权。详见刘江华:《还珠III无教育意义 CETV3不能播》,文中提及徐光春和周济的谅解备忘录,内有“他(徐光春)还指出,中国教育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要纳入总局电视剧管理范畴,播出的电视剧片目按规定提前报总局审核。此外还应明确,这一特殊政策只限于中国教育电视台,不能扩大范围,避免造成混乱。”详见:
<http://www.66wen.com/05wx/xinwen/guangbo/20060817/33171.html>。

^③ 详见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会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2008年1月31日施行,<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7/12/29/20071229131521450172.html>。

CCTV 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这种担心直接导致了 CCTV—9 的改版。从 2010 年 4 月 26 日晚间开始,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英语国际频道改版为英语新闻频道,频道的标识也从 CCTV—9 调整为 CCTV NEWS。

的确,目前在中国,新华社是唯一可能与中央电视台竞争对外传播的对手。作为全球化的最初表现之一,四大全球通讯社皆以国际传播为职志。自 1931 年成立、1949 年成为国家通讯社以来,遍布海内外的记者为新华社提供了雄厚的新闻采集力量,包括新增的电视新闻采集力量。特别是,新华社在国际采访中具有多语种的人才优势,此点为中央电视台所不及。

3、电视新闻体制的创新突破?

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传播媒体的多媒介化。发展视频报道,乃至创办真正的电视网,是新华社的既定方针,且实施步伐迅速有序:2008 年 7 月 1 日,新华社推出英语视频新闻;12 月 30 日,推出了与图文线路并行的视频新闻专线;2009 年 9 月 1 日,新华社把电视素材和成品节目合一的线路,分拆成电视通稿线路和电视成品线路,为专门的电视服务奠定了基础。同时,新华社兴办手机电视台,向地方电视台营销“新华视点”电视专栏,并成功打入台湾电视节目。显然,新华社已具备相当的电视节目基础。

2010 年,CNC 推出面向全球的 24 小时播出英语节目后,成为全球第九家全新闻国际频道。新华社还计划推进俄语、法语、日语、西语、葡语、阿语等各语种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①,显示了新华社在全球范围发展电视的动机和潜力。

虽然 CNC 竭力避免与 CCTV 相提并论,并一再表示,不会与 CCTV 形成正面竞争;但这种安抚并不能令广播电视人放心。诚然,目前 CNC 的电视专业程度还很低,而且只限于单纯的对外传播、新媒体传播和地方传播(例如与黑龙江电视台的合作)。但是,以新华社在新闻报道和国际传播方面的传统优势,加上它在国内传媒界数一数二的地位,会不会在某一天超过、压倒甚至取代 CCTV 的国际电视传播角色?这是广电系统不能不担心的问题。

不仅如此,让 CCTV 甚至广电总局考虑的问题可能还有,长期以来实行的行业之间约定俗成的壁垒现在似乎已经被打破,这将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新华社能够以对外传播和“走出去”的名义染指电视,那么《人民日报》能否以同样的理由参与进来?

《人民日报》也有突破局限的需求和潜力。2010 年的时候,“人民电视”日播节目已达 12 小时,每周原创内容有 200 多分钟,日访问量达到 300 万^②。“人民电视”难道能够满足于目前这种局限性的地位,而不仿效新华社的先例,开办真正的电视吗?推出“人民电视”的举动,尤其是采用“人民电视”(而不是人民视频)的名称,反映了某种发展的意图。

传统上,广播电视相比于通讯社和报纸,是弱势的媒介,只因借助媒介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广播电视特有的技术手段,才获得了现在平起平坐,甚至(有时)略胜一筹的机会。如果《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在声望、经验和能力等各方面都可能更具优势的国内主流媒体加入电视竞争,广播电视界将何以自保?广电总局曾以“意识形态属性”和“国家安全考量”为由,成功地说服国家阻止电信业大肆进入广电内容传播。这一次,面对更加成熟的传统媒体,它有什么雄辩的理由,阻止它们争夺广播的领地;又有什么充足的论据,说服国家相信自己独家垄断的合理性?以“走出去”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能否继续支持广播电视排他性的守土责任?

在广播管理者的心目中,电视走出去仍然是行业内部的事务。2002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被称为“大胆”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广电总局第 12 号令)中,第四条规定,只有“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可申请从事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业务。”广电总局仍然牢牢掌握广播电视频率独家资源占有权。

传媒“走出去”的资格,与所有获得特殊关照而“走出去”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格一

^① 东方早报:《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今天上星播出》。

^② 李志伟:《人民电视:一家报纸的“触电”尝试》。

样,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走出去”是主流顶尖媒体的权力游戏和在有限范围内的资源竞争。只有国家媒体,而且是顶尖的国家媒体中的翘楚,才有可能拿到对外宣传的各种“工程”、“大单”。所以电视“走出去”其实是一场影响力之争,对潜在资源和未来地位的竞争。

但是,这种竞争将带来“全媒体”的景象与可能的中国新闻(包括电视新闻)体制创新。

不过,CNC能够在这场明为“走出(国家)去”,实为“走进(广播电视)来”的竞争中胜出吗?如果必须通过“走出去”的方式“走进来”,CNC在海外有获胜的把握吗?

事实上,CNC面临着许多内忧外患,打拼国际市场并不容易。

三、试析新华电视的矛盾与困局:内外支绌

新华社在构思“概念”时,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观众的角度看,传播面最广的还是电视,所以我们逐渐提出了‘新华社电视’的概念”^①。但是最初,新华社强调的是视频内容的供应,如承认“办电视”,但不承认“办电视台”^②。最后,诞生的是多频道的电视网、商业电视媒介公司,是不叫电视台的电视台。

在全媒体时代,向别的领域扩展是强化自身、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跨行业经营也是全球环境和国内趋势。

中国的大众传媒都已成为企业型的经济实体,都有“发展”(GDP、政绩、利润)的压力和冲动。以往,中国广播电视界更为心仪的对象是公共性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而现在,模仿和学习最多的是商业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或者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福克斯广播公司(FOX)。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传媒日益突出的产业属性。

但是,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一两个成功的案例之外,大多数国际新闻频道本身很难产生利润。它们有的靠国家资金资助,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日本广播公司;要么靠商业投入,例如半岛电视台。它们都不是靠新闻赢利的。因此,CNC开展的,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

但是,“走出去”首先是一项涉及中国国际形象、提升中国话语权的政治工程,是一种根据目前体制的要求而从事的“对外宣传”。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新华社能够从国家获得多大的支持,包括政策的支持,财政的支持。

可以说,新华电视“走出去”负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经济的。只不过,政治的使命要通过经济的使命去完成、去实现。然而,这绝非易事。

(一) 尴尬的双重使命和内外说辞

肩负政治和经济双重使命,面对国内外疑问的目光,新华社进行了艰难的解释。大体上,对内和对外有两套修辞。一方面,对国外,新华社竭力消除自己“宣传机器”的传统印象,尽量突出商业“经营”的市场特色——这样才不会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抵制。另一方面,对国内,新华社必须强调其肩负的国家使命,避免商业竞争的口实——才能获得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和广播界同行的谅解。然而,互相矛盾的宣传口径,使新华社很难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新华电视定义;在一个全球信息流通的时代,也很难树立一个鲜明统一的正面形象。

对内,CNC强调自己的政治使命和外宣任务,表明自己不与中央电视台进行国内竞争的诚意,以安抚广播电视同行。

CNC指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便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新华社做电视并不是着眼于国内市场,而更多着眼于国

^① 胡里:《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解读“新华社电视”》,2009-12-31,
http://media.ifeng.com/news/newmedia/web/200912/1231_4266_1494349.shtml。

^② 《“新华社电视”起步快跑 影响电视新闻格局》,2009-12-31,
http://media.ifeng.com/news/newmedia/web/200912/1231_4266_1494342.shtml。

家传播能力的建设。“在新闻的比重中,我们的设想是国际新闻要超过国内新闻。”^①也就是说,CNC不与CCTV争地盘,主打国际宣传牌,志在争夺国际问题话语权。

CNC还强调,新华社对电视台绝对控股^②,电视业务和人力的投入是混在一起算的(亦即事业型的)。新华社为电视投入巨大,不计回报。

产出呢?新华社视频专线的基准价是100万元/年,即使全国400个电视台都订了,也只有4个亿,还不抵一个卫视频道的广告收入,况且西部地区有很多台可以打折甚至赊账。所以,新华电视不是一个纯经营的项目,主要目标不在商业市场和经济利益。

对广播系统的担忧,CNC解释说,它与不少地方台合作办节目的联合,不是要与央视竞争,也不可能对央视产生威胁:“我们与央视的最大区别在于错位发展。不把国内市场作为主战场,我们一直强调新华社的舞台、市场在国际。”^③

当然,要想完全解除广播电视系统的疑虑,并不容易。

对外,CNC则一再申明产业属性,极力强调商业模式和市场追求,详细列举商业经营的各种可能性;同时极力否定宣传机器的标签,坚称:“我们是新闻频道,不是宣传电台”^④。

当然,要让全世界相信,CNC不是一个宣传工具,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来自中国,因为我们是新华社,大家都对我们抱有一些疑虑。”^⑤“为此,CNC高管们谨慎地将自己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而不是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进行比较。”^⑥

不能不承认,国际上对中国传媒机构存在广泛的敌意。中国电视宣传最为外人诟病的是媒体不独立,报道不自主。而“走出去”战略正好提供了中国媒体依附性的例证。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西方受众对CNC反应的例子是,《纽约时报》报道了CNC开播的消息,在讨论中,读者留言道:“中国,抱歉告诉你,这次你们会失败”(China, you are going to fail on this one. Sorry to break it to you.);“就像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讲话一样,我也不能信任新华(电视)”(I cannot trust Xinhua as anything more than spokespeopl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如果它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话,那我就很怀疑它的新闻会没有偏见。(If it is initia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 doubt the news will be unbiased.)”^⑦

新华电视开播后,美联社、《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电视网等国际电视媒体均进行了报道,有的进行了含沙射影的负面评论。然后,便是长期的沉默和不屑一顾。CNC的信号仿佛消失在空气中。

因此,与经济上的损耗相比,“走出去”的政治成功更加艰难。作为国家工程,经济上无论赔累多少,尚可(最终)由国家埋单;政治上的突破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希望十分渺茫。这不是新华社一家的问题,而是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共同问题。

就电视传播而言,苦心经营了10年的CCTV英语频道至今尚未能有效地走出去,实施软实力;虽然它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几乎做到了极致。新华电视以有限的电视经验,特别是以与CCTV大同小异的体制环境,如何能够后来居上,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① 胡里:《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解读“新华社电视”》。

^② 东方早报:《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今天上星播出》。

^③ 胡里:《新华社副总编辑吴锦才解读“新华社电视”》。

^④ 原报道是英文:“We are a news channel, not a propaganda station.”见 China's Xinhua launches global English TV channel, July 1, 2010, http://news.bbc.co.uk/2/hi/world/asia_pacific/10473645.stm.

^⑤ 席佳琳:《新华社全天候英语电视频道开播》,载英国《金融时报》,2010-07-0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370>.

^⑥ 见席佳琳:《新华社全天候英语电视频道开播》。当然,出于其他原因,CNC又必须否认自己是中国的CNN(见 Xinhua's CNC Doesn't 'Want to Be' China's CNN', December 31, 2009,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Real Time Report (中国实时报),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09/12/31/xinhuas-cnc-doesn%E2%80%99t-want-to-be-%E2%80%98china%E2%80%99s-cnn%E2%80%99/>.)。

^⑦ Can China Gain Journalistic Credibility? July 12, 2010,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0/7/12/can-china-gain-journalistic-credibility>.

而且,无论是进一步提升电视化的品质,还是实施商业化的战略,CNC都比CCTV有更长的路要走。在电视业务方面,新华电视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实践和经验有关。新华电视距离中央电视台传播形式上的精良与时尚,差距还相当大。新华社的优势在新闻采访方面;而电视其实是一种表演行业:是把已知未知的新闻事件以一种视觉化的愉悦方式表达出来的过程。电视的语言是独特的。在这方面,新华社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最重要的软实力是思想的影响力。缺乏有吸引力的思想,缺乏可信度,无论用多么流利的英语来表达,人家也不乐意听。正如白岩松所说,只有新闻改革取得实效,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才可能大大加强:“当中国的新闻、中国的传媒更按新闻规律办事,更尊重新闻事实,更开放更透明的时候,它就已经是(良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了。”^①

长期以来,新华社不具有大众传播阵地和言论表达传统,相对于《人民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新华社在话语主导方面并不占优势。作为主流媒体和试验项目,CNC更不可能像今天的《环球时报》那样自在地发言,以另类的方式表明接近官方的立场。在新闻评论和思想影响力方面,新华电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必说以电视为独特方式的新闻评论了。

但是,新华电视的实践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 新华电视“走出去”的意义

新华社电视新闻网,特别是它的英语频道,打破了央视独此一家的局面,从而带来中国传媒体制的内部竞争。在内部竞争和外部接触环境下积累的经验 and 增加的實力可能加快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步伐,并可能导致中国整个传媒生态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华电视对于中国电视的宣传改革很有意义。

在竞争的环境中,各个媒体,甚至同一媒体的各个部分,做法不尽一致,从而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差异化的新闻传播景观。外媒报道说,2009年2月2日,中国电视媒体直播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时,遭遇“扔鞋”插曲,有的电视台中断直播,有的持续。这来源于不同媒体的不同理解,也来源于媒体间竞争的需要^②。持续转播使中国人民了解到更多的新闻事实:中国在海外遭遇的不理解、国外的“民主”习惯,还有温总理应对时的镇定。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垄断英国广播电视市场已达20年,由于一家独大,它高高在上、傲慢冷漠、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在商业电视独立广播系统(ITV)于1955年加入竞争后,BBC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随着双轨制的形成和完善,在和国内ITV与国际CNN的竞争中,BBC世界频道逐渐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介。

中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经验,也很说明问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上海、湖南等省级广电传媒,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都曾对CCTV产生过改革的压力;近年来省级卫视的联合行动则更进一步冲击着央视的电视垄断。但在中国传媒的等级制框架中,这些并非同一层面的竞争不足以威胁(亦即推动)央视进行釜底抽薪的改革。中国电视事业的成熟和完善,有赖于新华电视这样的强大竞争者加入。

不过,在中国国内,无论是人民网还是新华电视的网上“小屏幕”,都不如电视台的大屏幕影响广泛;无论是手机还是互联网社群,都还赶不上中央电视台的集中号召力。况且,如果电视真要“走出去”,CCTV肯定会更加轻车熟路一些,毕竟电视是它的专业,毕竟它经验丰富、资源广泛。很可能,中央电视台是新华电视竞争的最大受益者。

如果新华电视把现成的电视人挖走一批,在引进人才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电视传播队伍,就像当年凤凰卫视所做的那样,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不过,凤凰卫视的成功在于它钻了中央

^① 张英、余舒虹:《白岩松:改版重点不在<新闻联播>》,载《南方周末》,2009-06-17,
<http://www.infzm.com/content/30160>。

^② “Beijing launching a 'Chinese CNN' to burnish image abroad, But winning credibility as an objective news source will be a hurdle, experts say”.<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09/0205/p01s01-woap.html>.

电视台体制和政策的空子,填补了市场空白。新华电视能够做到这个吗?

当然,如果说中国传媒包括电视走出去,政治影响力普遍不被看好的话,传媒走出去的经济效果却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未定问题。这取决于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政治形象决定了中国外宣市场的局促;而没有市场就没有收益。新华电视虽然设想了很多国内外融资的方法,并寻求上市,但能否揽到资金,则完全取决于赢利的前景。

新华电视目前已在香港成立公司,今后会以商业方式经营。但是,外资投入看中的是新华社的品牌和国家媒体的政治资源。如果按照传统的宣传方式“走出去”经营的话,在海外未必能够赚钱,国际资本也可能不看好这样的国家工程,未必愿意长期支持。

新华电视能否长期办下去(暂且不谈能否成功地发挥影响力),关键要看党和国家支持的力度。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究竟愿意为新华电视“走出去”支付多大的成本。广西电视台、云南电视台为了走进东南亚和南亚,作出了很大的“奉献”,对资金困难已经叫苦不迭。他们都希望中央为这些“外宣”任务输血打气,而且源源不断。CNC 能否维持、能维持多久,要看中央准备为新华电视提供多少钱,或者新华社能够从财政拨款中挤出多少钱。如果在赤字经营一段时间后依然不能赢利,则必须改变“外宣”思路、转变经营方法。

四、结语:新华电视的市场竞争策略断想

新华社办电视,还是有一定保障的。新华社在中国传媒体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首先,新华社享有国内外最广泛的新闻来源;其次,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有很好的国内口碑。

应该说,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一样,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始终是非常优秀的、尊贵的品牌。这源于广大新闻工作者和传媒人士多年来的奋斗与贡献;也来自人民对国家媒体习惯性的景仰与崇拜。由于享有独特的政治资源及随之而来的其他资源,主流媒体的商业经营部分在国内大都成功。

然而,这些国家媒体在中国人民中的可信度与它们在外国公众中的不可信度恰成比例。国外受众对新华社的不信任恰恰基于其“国家媒体”(也就是“党的喉舌”)的标签,和不可避免的先决立场。我曾在新西兰、新加坡做过一些调查访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新华社的报道多快、多准,国外媒体就是不听、不用;国外受众则是不理会,或者不相信。

所以,为新华电视计,成功之道似应为:**对外传播,从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开始;全球传播,从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开始。**也就是说,在国际上,借助对中国问题的独家报道,首先争取新华电视对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其次,在“走向全球”的道路上,首先通过国内新闻传播培育市场、消化成本、提高影响力,并最终走向世界。

在中国电视领域,有两种国际新闻传播。一种是针对国内公众提供国际消息的新闻节目,称为“国际新闻”;第二种是面向海外或者世界,介绍中国情况、文化、现状和问题的,称为“对外宣传”,但仍以新闻消息为主。长期以来,新华社所从事的、实际上也擅长的,是第一种,亦即对国内公众的国际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的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客观报道的新闻消息;另一种是表达主观立场、观点、看法的新闻评论。当然,评论是建立在报道基础上的。在全球信息流通的情况下,新闻消息已经不再稀缺,对外传播主要提供的是认识和思想,亦即新闻评论。而长期以来,新华社所从事的、实际上也擅长的,是新闻报道。

(一) 对外传播从中国新闻报道开始

目前,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话语权虽然有所提升,但尚未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国外受众在西方媒介影响下,先入为主,首先质疑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观察框架(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报道的信任。所以,中国对世界的报道没有多少影响力。

而对中国新闻的报道,虽然大多数西方人在大多数时候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但在中国

真正发生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例如奥运会、四川地震、新疆、西藏暴乱时),因为缺少新闻来源,便不能不采用大量中国本地的报道。此时,国内消息带有国际“必看”的优势,较容易形成影响力。

由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新闻在全球的比重逐步增加。甚至中国对全球事件的反应,都被日益看重。但是,外国媒体和外国记者未必能够接触到中国国内的许多新闻;且它们的报道带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局限性极大。因此,新华社的报道有可能成为反映中国现状,包括中国环境、中国舆论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外界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表态,特别是具有新闻内容和价值的表态日益关注;但对缺乏独立评论立场的传媒言论则未必特别重视。新华电视可以客观表达国家领导人的言论,特别是其关于中国立场的言论。同时,新华电视也应该广泛表达国内各阶层、各群体的多元话语,以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言论。

为了使新闻真正具有影响力,新华电视需要更开放,更客观,才能取信于已有成见并仍然主要相信本国媒体宣传的西方受众。

(二) 全球传播从对内传播开始

在全球传播时代,影响力和话语权是没有国界的,也是能够互相“传染”的。但很难设想,一个不能在本国扎根生长的大众传播媒体,能够迅速在国外落地开花。

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美国外宣机构大约是专门对外、不得对内的绝无仅有的国家供养体系。但“美国之音”的“辉煌年代”是基于冷战时期的特殊背景。虽然美国政府重金投入,美国之音也不断调整战略策略,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之音的宣传已经衰落。

毋庸讳言,在当前混乱的中国传媒市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真正的新闻报道有更高的公信力——对中国大陆民众而言。这种“公信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媒介专业性的增强,在国际上也可能会增强——当然,新闻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环节。

较之全球市场,中国国内的传播市场更有潜力,也更有机会,培育一个新的电视媒体。国内传播可以增强新华电视的实战经验、传播能力,亦即软实力。“画地为牢”的传统体制应该突破了。为了走向全球去,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国内市场来。

当然,许多问题会出现,例如:中国需要不需要、可能不可能同时支持,并一下子出现几个强有力的国际性大媒体,竞争同一个国际新闻市场?如果需要并可能,是不是可以考虑分工合作的问题,竞争不同的受众市场及其传播需求?按照中国重视级别、讲究身份的传统思维,如果新华电视获得国内外传播的身份,尤其是获得经济效益的话,人民电视、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包括省级卫视,会不会都来攀比,并克隆出大同小异的一堆电视频道?此外,改变媒体的官方标签,成为商业公司的实践是否可能成功?总之,中国需要解决的是竞争的有序性和传播策略的区别性问题。

附录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期外请讲座与学术论坛信息

【CNN 驻外记者齐迈克访问新闻与传播学院】4月13日,CNN 驻外记者齐迈克携其纪录片《解析中国之旅:改变世界的一周》访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与新闻学院师生就纪录片所反映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纪录片通过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时随行的美国记者的回忆,展现了40年前这一中美关系史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纪录片放映结束后,齐迈克还就“近几十年来,中国媒体和中国人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记者如何报道重大国际性事件”等问题与新闻学院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齐迈可先生是前 CNN 驻亚洲特派员,担任驻外记者长达30多年,获得过包括纽约电影节银奖以及亚洲电视奖等在内的诸多奖项。齐迈可先生曾作为记者为美中学院的2008年纪录片“Election 08'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a”工作。他和中国学院的师生一起完成了一系列纪录片和多媒体网站“Reporting China”(报道中国),集中展示了美国新闻机构从1940年至今对中国的报道工作。

【“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论坛”在清华举行】5月12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共同主办,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清华-网易未来媒体研究中心、全球传媒评论编辑部承办的“全媒体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创新论坛”在主楼接待厅举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会长郭镇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论坛既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课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资助的重要学术活动。论坛分为包括嘉宾主旨发言、分论坛、互动讨论等环节。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曲莹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美国国际记者中心(ICFJ)主席 Joyce Barnathan、美国普度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Howard Sypher、美国德州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Stephen Reese、安可 APCO(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Gregory Gilligan、日本朝日新闻社前总编西村阳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Andrew Leckey 等60余位来自海内外学术界和媒体界的高层负责人和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全球模式”与“本土经验”,“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培养之间的融合与对接”,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适应传媒数字化、产业化发展”,“如何在实现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如何利用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难得机遇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加强与海外媒体业界和学界的交流与对话?”等热点前沿议题发表主题演讲,进行广泛讨论。

论坛吸引了近200位嘉宾与清华大学师生的参与和关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交流环节,演讲嘉宾与在场学生进行热烈互动,深度探讨。本场论坛由搜狐网现场直播,《清新时报》进行全程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教授 Alan Mutter 来我院演讲】2012年5月19日下午2:00—4:30,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教授 Alan Mutter(阿兰·马特)在新

闻与传播学院宏盟楼 204 报告厅,进行了题为“美国报业的困境与重生——来自硅谷的媒体研究报告”的讲座。作为资深的高科技传媒企业经营者和研究专家,Mutter 教授利用大量一手数据、资料,为到场师生分析了美国的媒介环境下媒介新技术对于报业的巨大冲击,以及报业做出的相应转变,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飞速发展给报业带来的冲击与机遇。同时,他还与到场师生还就媒体的功能转型、新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素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此次 Mutter 教授是应我院陈昌凤教授邀请前来讲座,陪同前来的还有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周敏等。

【北卡大学 Jock Lauterer 先生来我院做“美国社区报”讲座】应我院《新闻编辑》、《高级新闻编辑》两门课程邀请,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传播学院社区媒体中心主任、富布莱特高级专家 Jock Lauterer 先生 5 月 20 日下午来我院做了题为《报业正在消亡?请暂缓发布报告》的讲座。他在讲座中认为,“小的是好的”,社区报作为“美国的真实心跳”,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他结合自己创办两家社区报的经验,谈了社区报的功能与特点,认为社区报像一个城市的水处理系统一样,是一个社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区报一要讲真话,二要善于经营以维持日常运作。

Lauterer 先生还与在座同学、嘉宾就中国社区报的前途、社区报的舆论监督功能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讲座结束后,Lauterer 先生还邀请到场同学合影,并称赞大家的听课热情很高。此外他还向同学们发出邀请,希望同学们赴美交流并利用 Skype 软件与该院学生进行视频沟通。

Jock Lauterer 是“报纸消亡论”的提出者,北卡大学菲利普·迈耶的同事,曾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并有 15 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他目前在北卡大学讲授《社区新闻》、《新闻写作》等课程,专著《社区新闻:亲近个体》(Community Journalism)一书作为全美范围内的教材被广泛采用。

这次讲座由雷建军老师推荐。《走近美国社区报》一书的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外语学院陈凯副教授进行了现场解说,《新民晚报》社区版负责人等参加了讲座并参与讨论。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终身教授沈福元来我院讲座】5 月 24 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沈福元教授到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于学院环球资源厅做了题目为“媒体故事的力量——叙事对于大众态度及意见的影响”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史安斌副院长主持,20 多位学院师生听取了讲座。

沈福元教授认为,“叙事”可以使普通的故事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将议题以叙事的方式呈现能够影响大众的情感反应及认知反应。讲座以叙事投入理论等相关传播理论为核心,概述了叙事理论,并将其与传统媒介效果理论与范式作对比,从而展现出媒体“叙事”的强大力量。同时,沈教授还介绍了自己关于叙事理论的最新研究结果,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了简单概述。最后,沈教授就在场学生提出的问题与新闻学院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沈福元教授现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终身教授,在包括《传播学杂志》、《广告学杂志》在内的众多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目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手段的效果、文化定制信息以及新闻框架对于社会议题的影响等方面。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Richard R. John 教授来我院讲座】5 月 24 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Richard R. John,应邀为我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国家的网络化:美国电信的发明》的演讲。

Richard R. John 教授是致力于新闻及通信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于 2010 年出版了与此次讲座同名的专著 *Network Nation: 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该书曾获新闻及大众传媒教育协会 2010 年度最佳历史图书奖,美国企业史学会 2011 年度拉尔夫·戈莫里奖。

此次讲座主要围绕上述新书的核心论点展开。John 认为，在美国，电话网是互联网形成的基础，贝尔实验室和 ATT 曾经发明了很多信息时代的关键技术。要研究今日互联网的问题，必须回到其诞生原点，回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脉络中一探究竟。讲座中，John 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沟通媒介的电报和电话，如何在初创时期（1840-1920）成为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象征的故事。他认为，媒体既要反对商业机构的垄断，也要防止政府部门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